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入库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 杨小草等 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
窦崧玮 青年悬浮期的“分”与“合”：群体类型差异与弱自主性探析
刘雅静 行政效能提升：“十四五”回顾与“十五五”展望
魏志达 作风何以关乎党性？

2025年第5期（总第115期）
第24卷 双月刊 9月30日出版

征稿启事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是中共合肥市委主管，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合肥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理论刊物。本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关注改革发展前沿问题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紧密围绕省情、市情选稿组稿，大力开展政策研究、市情研究、咨政研究和理论宣传，形成了具有浓厚时代特征、地域特点、党校特色的理论宣传平台。

本刊于2003年入编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并进入CNKI中心网站。现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入库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为进一步提高本刊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将本刊打造成为“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的学术名片和重要窗口”，现向社会公开征稿，热诚欢迎广大社科工作者惠赐佳作。

投稿须知：

1. 稿件应当主题突出、观点鲜明、论证严密、语言文字合乎规范，有独到见解，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实践借鉴价值。本刊特别欢迎关于“安徽省情、合肥市情”方面的研究报告。

2. 稿件字数以4000—10000字为宜。

3. 将正文以附件形式发过来，并将单位名称、详细地址、邮编、电话、电邮、摘要、关键词（3—5个）、来稿日期、作者简介（出生日期、民族、职称职务、学历学位、研究方向等）放在正文标题下。

4. 参考文献、注释等放在文尾，勿用脚注或夹注。注释是作者对题名、标题或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注释须放在正文后的参考文献之前，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加圆图标注：①、②、③……。参考文献是作者写论文时所用引文的出处或参阅的各种书刊资料，须集中列在论文的文末，参考文献序号标注：[1]、[2]、[3]……

5. 来稿文责自负，在不改变文章主要观点的前提下本刊编辑部有权对文章作适当修改，若作者不同意修改请在来稿时作特别说明。

6. 本刊已被“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等收录，如作者无特别声明，即视为同意在网站或光盘上同时刊出。

7. 请勿一稿多投。本刊的选稿周期为3个月，3个月内未收到用稿通知的，作者可自行处理。请作者自留底稿，来稿一律不退。

8. 本刊选稿以质量为唯一标准，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来稿一经刊用即付稿酬并寄送2本样刊。

9. 本刊目前并无网上投稿平台，也未委托任何组织或个人代为征稿。一些打着本刊所谓“官网”名义的网上投稿、征稿平台，骗取作者审稿费、发表费的行为，均与本刊无关，均属非法行为。请投稿作者切勿上当受骗。

本刊样刊浏览网址：<http://hfdx.hfzhi.com/>

本刊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明理路《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邮政编码：230031

联系电话：（0551）62206658 62206629

电子信箱：XB1233@126.com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中共合肥市委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

出版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陈得良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俊 王辉龙 王良仲 王 义 王 玉 王智源 江 飞
江 浩 刘玉勉 孙维红 陈得良 何永义 李安福 李敏琪
李宗开 范观兵 金 玥 周良金 胡爱敏 胡厚翠 凌德政
陶晓娟 黄传霞 程千宜 瞿晓陆

马 俊
黄宁平
朱少家
徐书琴

理论视野

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

——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杨小草 王玉堂(3)

青年悬浮期的“分”与“合”:群体类型差异与弱自主性探析 ……………窦崧玮(9)

策论园地

行政效能提升:“十四五”回顾与“十五五”展望……………刘雅静(18)

从“农业‘大包干’”到“农业社会化服务”:小岗村农村改革的内在机理与实践启示

……………瞿红霞(26)

数智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意蕴、现实挑战和实践路径……何华生 晏志伟(33)

本刊已许可本刊合作单位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相关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明理路
230031
(0551)62206658;62206629
xb1233@ 126.com
ISSN 1674-5000
CN 34-1249/Z



学思札记

作风何以关乎党性?

- 列宁关于执政党作风问题的重要阐释……………魏志达(39)
- 从“民族壁垒”到“阶级联合”:列宁胸怀天下思想的三维审视……………李德琴(49)

信息荟萃

- “‘科技变量’如何变为强劲动能”等五则……………(57)

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

——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

杨小草 王玉堂

(东平县委党校,山东 东平 271500)

[摘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系统展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过程、科学体系、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和原创性贡献,科学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为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新征程上,一定要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切实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解深、领悟透、把握准、运用好,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提升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奋力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环境保护

《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收入习近平总书记 2012 年 12 月至 2025 年 4 月期间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共有报告、讲话、演讲、指示、批示等 79 篇^{[1]-2}。这些重要著作,科学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1][73]}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一个科学理论指导的新阶段。“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

来的大计”^{[1][6]}。新征程上,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以下简称《文选》),深刻理解、系统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溯其本源,明其要义,识其创新,悟其真谛,对于深入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

一、《文选》系统呈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过程和丰富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

收稿日期:2025-09-19

作者简介:杨小草,中共山东省东平县委党校讲师。王玉堂,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员。

略意义,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1]。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升华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又一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态文明篇”。《文选》系统呈现了这一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科学体系、丰富内涵和原创性贡献。

(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生态文明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关系出发,深刻阐明“要实现永续发展,必须抓好生态文明建设”^[1],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1]66},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生态兴衰决定文明存续。人类社会史既是一部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史,也是一部自然对人类的哺育史。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2]这一科学论断。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进一步强调,“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1]67}。人类文明演进规律表明,只有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才能在开发利用自然上少走弯路,不断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洞察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基础的条件,强调“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前提和基础,自觉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在绿色转型中推动发展实

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1]279-280},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全局计、为子孙谋”^{[1]95}的科学态度和历史担当。

(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深刻阐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强调“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1]61},“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1]6},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人与自然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95},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和生活、生存和发展。《文选》提出,“我们应该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对自然心存敬畏”^{[1]63},并告诫说,“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1]74},要求“经济增长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1]9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洞察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自然生态演进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科学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超越“征服自然”的狂妄和“畏惧自然”的被动,坚守“保护自然”的主动和“利用自然”的理性,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科学指引。

(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环境与民生的关系出发,深刻阐明“环境就是民生”^{[1]175-176},强调“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1]3},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生观。“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基础的条件,是我国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1]103},而且,经济社会越是发展,人们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越是强烈。《文选》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128],必须“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42]，“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116]。把良好生态环境视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意味着建设生态文明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任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深厚为民情怀,把绿水青山上升为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鲜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1175-176],深化和拓展了传统意义上的民生观和幸福观,赋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560]以更多生态文明内涵。

(四)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深刻阐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116],有效破解了保护环境必然牺牲发展的形而上学困境,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永恒主题,但世界是矛盾的,如何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既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两山”理念的提出,打破了发展与保护“二元对立”的零和思维,开辟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1153]的新路径,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而且深度影响了世界,先后被写入多个联合国机构官方文件和报告,成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共同语言^[6]。《文选》提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1153]，“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124]，“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

劲”^[1175]。基于这一重大论断,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非但不是矛盾对立的,而且良好生态环境本身就是最大的财富、最大的优势、最响亮的品牌,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能够“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7153],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1174-175],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和生态辩证统一关系的认识,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协同共进、相得益彰指明了方向。

(五)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系统观念,深刻阐明“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124]的重大论断,强调“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1258],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系统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有联系的整体”^[81346],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文选》提出,“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1176]，“保护生态环境,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124],要坚持系统治理。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决定了生态环境治理的系统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深刻揭示了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为系统谋划、科学布局、统筹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路径指引和重要方法论。

(六)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胸怀天下的全球视野,深刻阐明国内与国际的关系,提出“地球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1178]，“建设全

球生态文明,需要各国齐心协力,共同促进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1]63},在全球生态治理领域彰显了我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自然不辨国别,生态不识国界,海水可以自由自在地横流世界,空气也能不用签证出入各国。《文选》提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各国的共同责任”^{[1]63},世界各国应“携起手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1]246}。马克思说,“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3]257}。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为人类而工作”^{[9]459}。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1]311},将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作为根本价值旨归,为推动全球生态治理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富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时代是思想之母,时代风云有多么壮阔,思想创造就有多么活跃;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探索有多么生动,理论创新就有多么丰富^[10]。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探索中形成,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真理光芒,凝聚着中华民族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历史智慧和思想精华,内涵丰富、系统完备、博大精深,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必须以《文选》为基本教材,深学细悟、融会贯通,真正把握要旨、领悟真谛,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二、《文选》贯穿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要求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引领时代^[11]。《文选》收入的重要著作,既有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深刻洞察和科学把握、对“建设

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战略擘画和系统部署,又有对“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路径指引和方法指导,贯穿着鲜明的实践要求。

(一) 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5]192}。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集中体现为“十个坚持”^{[1]22},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既体现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也是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新成效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1]292}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坚持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不动摇”^{[1]292},“建立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1]292}。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1]12}。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1]235}的生态文明建设格局。

(二) 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凝聚生态文明建设合力。“人心齐,泰山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1]234}广泛开展群众性生态文明示范创建活动,引导“生活方式绿色革命,倒逼生产方式绿色转型”^{[1]180}。加强新时代生态文化建设,赓续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文脉,

“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培育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11]176},引导社会成员更加自觉地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人人争当绿色使者、生态先锋”^{[13]335},人人成为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以实际行动减少能源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环境损害,由此增强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主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

(三)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绿色低碳发展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11]302},“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11]230}。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必须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11]175},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增长模式。要“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要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使发展建立在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11]283},逐步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四)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11]210}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源于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要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加快推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恢复和增强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有机结合,持续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密不可分、相互作用”^{[11]182}。要按照“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宽广度”^{[11]284}的要求,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清气净的美丽家园,“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11]164}。

(五)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地球只有一个,需要共同呵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11]161}“建设美丽家园是人类共同梦想”^{[11]193}。面对全球生态危机,国际社会必须协调行动、携手合作,“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11]192},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中国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11]178},始终坚定奉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努力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4]157}。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积极引导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变革,推动形成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智慧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解决方案,让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生态治理智慧和生态文明建设成功实践更好地启迪未来、惠及世界,带给人类更多生态福祉,彰显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1]8},“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11]8}。建设生态文明,既是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也是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要求,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治标治本多管齐下,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12],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进。

三、结语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15]42}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依存、相互影响。良好生态环境是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支撑,发展方式、生活方式又直接影响生态环境演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1]28}新时代新征程上,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一定要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切实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解深、领悟透、把握准、运用好,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提升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奋力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面临严峻生态环境挑战的世界场景中充分展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跨越山河的真理力量、改变山河的实践伟力和美丽中国“风景这边独好”的蓬勃气象。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
- [2] 习近平.生态兴则文明兴——推进生

态建设打造“绿色浙江”[J].求是,2003(13):42-44.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5]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6] 胡登胜.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N].光明日报,2025-08-15.
- [7]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0] 王玉堂.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J].创新,2023(6):1-7.
- [11] 刘东锋,王玉堂.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观察、把握、引领时代[N].湖南日报,2024-05-09.
- [12]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2022.
-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 [14]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5] 管子[M].李山,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

责任编辑:朱少家

青年悬浮期的“分”与“合”:群体类型差异与弱自主性探析

窦崧玮

(南京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悬浮期”是当代青年在功绩社会的结构快速转型、就业形态日趋多元的当下,从受教育向就业、从校园向社会过渡呈现的一种状态,表现为目标模糊、角色未定、社会融入滞后的“未完成性”。这一群体既因背景、选择、境遇的不同呈现显著的类型分化(“分”),又共享着结构性压力下的相似困境(“合”)。深入探究青年悬浮期的群体类型差异,聚焦其“弱自主性”的共性特征,剖析背后的社会成因与个体困境,有益于为青年平稳度过悬浮期,从“弱自主”迈向“强自主”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青年悬浮期 类型分化 弱自主性 社会转型 过渡适应

“悬浮”(suspension)一词指物体或状态不落地、不固定、处于游离状态。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第一次将“悬浮”应用于社会研究之中。他指出,“悬浮”是对当下的一种悬置,是一种“不断流动但无法扎根”的状态。在功绩社会的结构快速转型、就业形态日趋多元的当下,“倦怠制造了一个允许逗留的闲适空间”^{[1]56},却让青年普遍面临着发展状态不稳定的“悬浮”困境。这一现象不仅关乎青年个体成长,更影响社会活力与稳定。青年悬浮期呈现鲜明的

“分”与“合”。“分”体现为群体动态分化,涵盖主动试错的探索者、被结构压力困住的停滞者、过渡地带的平衡者及表面稳定的精神游离者;“合”则表现为弱自主性共性,如决策依赖、行动空转与价值悬浮。而这一切源于宏观社会转型的机遇风险、中观支持的差异化供给及微观个体的适应差异。基于此,深入探究青年悬浮期的分合特征、成因,并从社会、家庭学校、个体层面探索超越路径,有益于为青年平稳度过悬浮期,从“弱自主”迈向“强自主”提供理论参考。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 2022 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东北抗联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立项编号:22JDSZK026)。

收稿日期:2025-09-22

作者简介:窦崧玮,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生。

一、青年悬浮期的“分”:群体类型的动态分化

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指出:“‘流动的’现代性的到来,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2] 33} 青年悬浮期作为青年从校园走向社会的过渡阶段,或在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因就业不稳定、生活状态不确定、价值认同模糊等因素,陷入的一种“未扎根”状态。这一时期并非单一的同质化现象,而是随着个体资源、社会环境与主观选择的差异,呈现出动态分化的群体类型。不同类型的青年在悬浮的主动性、行为策略与精神状态上存在显著差异,其背后既反映了个体对社会机遇的把握能力,也折射出结构性压力对青年发展的制约。

(一)“主动选择型”悬浮:以试错为策略的探索者

“主动选择型”悬浮青年是悬浮期群体中的“积极行动者”,他们并非被动接受不确定性,而是将“悬浮”视为一种主动的人生策略,以试错为路径探索职业方向与人生可能性。这类青年大多具备较强的家庭支持、学历优势或专业技能,对自身发展有较高期待,且愿意承担试错成本,通过频繁切换职业、尝试多元生活方式,寻找与自身能力、兴趣匹配的发展路径。

“主动选择型”悬浮青年的职业流动具有明确的“探索性”而非“盲目性”。部分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后不急于进入稳定岗位,而是选择“间隔年”(gap year)参与公益项目、自主创业或跨行业实习。一些拥有专业技能的青年则拒绝传统全职工作,以“自由职业者”身份承接不同项目,在多元实践中积累经验、拓展人脉。这类青年的悬浮状态往往具有阶段性特征,即当他们找到明确的职业定位或实现阶段性目标后,会主动结束悬浮以进入稳定发展阶段。

“主动选择型”悬浮的产生离不开三重支撑:一是家庭经济支持,使青年无需为生计被迫进入不适合的岗位;二是教育背景赋予的“选择权”,高学历、强技能青年在就业市场中更具议价能力,有更多机会尝试不同职业;三是社会观念的转变,“稳定即成功”的传统价值观逐渐淡化,“多元发展”“自我实现”成为青年群体的重要价值追求,为主动悬浮提供了观念支撑。

(二)“被动滞留型”悬浮:被结构性压力困住的停滞者

“被动滞留型”悬浮青年是社会结构性压力的“承受者”,他们因自身资源匮乏、外部机会稀缺,被迫陷入“想扎根而不得”的停滞状态。这类青年大多来自中低收入家庭,学历层次较低或缺乏核心技能,在就业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获得稳定、有发展空间的工作;部分青年则因户籍限制、区域发展差异,在大城市就业时面临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多重压力,无法实现真正的“社会融入”,最终陷入悬浮。

“被动滞留型”悬浮青年的职业状态呈现“不稳定、低质量”特征。他们多从事临时性、低技能、低薪酬的工作,职业流动频繁且无向上发展空间,“换工作”并非出于主动选择,而是因企业裁员、待遇低下或工作环境恶劣被迫离职。“被动滞留型”悬浮的根源在于结构性矛盾:一是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低技能岗位供过于求,而部分青年能力与高技能岗位需求不匹配,导致部分青年“就业难”与企业“用工荒”并存;二是临时性就业青年难以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基本福利,缺乏职业安全感;三是阶层固化趋势加剧,家庭背景对青年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来自弱势家庭的青年难以通过教育、就业实现阶层跃升,被迫在社会底层悬浮。此外,疫情等突发事件进一步加

剧了被动滞留的程度。疫情期间,服务业、制造业等行业受到严重冲击,大量低技能岗位消失,许多“被动滞留型”青年失去工作岗位,只能依靠打零工维持生计,悬浮期进一步延长。

(三)“半悬浮型”:在过渡地带摇摆的平衡者

“半悬浮型”青年是悬浮期群体中的“中间派”,他们既不像“主动选择型”那样主动试错,也不像“被动滞留型”那样完全被结构困住,而是在稳定与波动、“扎根”与“悬浮”之间寻找平衡,处于一种“过渡性”的悬浮状态。这类青年大多拥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但工作内容缺乏挑战性、发展空间有限,无法满足其自我实现需求。同时,他们又具备一定的资源与能力,渴望通过多元实践突破现状,最终在“稳定工作”与“个人追求”之间形成摇摆。

“半悬浮型”青年的生活呈现“双重性”:在工作日,他们遵守职场规则,从事稳定但缺乏激情的工作;在周末或业余时间,他们投入精力发展副业、参与兴趣社群,试图在稳定之外寻找自身价值和成就感。这种“半悬浮”状态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当副业发展良好、收入超过主业时,他们可能选择辞职,转为“主动选择型”悬浮;当副业遭遇挫折、收入不稳定时,他们会回归稳定工作,放弃多元尝试。还有部分青年长期处于“摇摆”状态,既不愿放弃稳定工作的保障,又无法割舍个人追求,陷入两难困境。

“半悬浮型”悬浮的产生源于“安全需求”与“自我实现需求”的冲突:一方面,受传统观念影响,青年及其家庭对“稳定的工作”存在较强依赖,认为稳定的收入、社会保障是生活的基础,不愿轻易放弃;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多元化发展,青年接触到更多元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对“自我实现”产

生强烈渴望,希望通过个人兴趣、副业发展证明自身价值。此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降低了副业门槛,为“半悬浮”状态提供了实现条件,使青年能够在稳定工作之外,低成本尝试多元实践。

(四)“隐性悬浮型”:表面稳定下的精神游离者

“隐性悬浮型”青年是悬浮期群体中最易被忽视的类型,他们在职业、生活层面看似稳定,但在精神层面却处于“游离”状态——对工作缺乏热情、对生活感到麻木、对未来没有期待,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归属感与价值感,最终在“表面稳定”与“精神空虚”之间形成割裂,成为“身体扎根、精神悬浮”的群体。

“隐性悬浮型”青年的“稳定”具有虚假性:在职业上,他们按时上下班、完成工作任务,但缺乏主动进取意识,对晋升、加薪等职业发展机会漠不关心,将工作视为“谋生工具”而非“价值载体”;在生活上,他们遵循“结婚、生子、买房”的传统路径,但对家庭生活缺乏投入,与家人缺乏深度沟通,社交活动仅限于必要的人情往来;在精神上,他们常感到孤独、迷茫,常通过刷短视频、打游戏等方式消磨时间,试图逃避内心的空虚,却难以真正缓解精神压力。这种“隐性悬浮”往往具有“长期性”特征,即由于表面生活稳定,青年缺乏改变的动力,精神悬浮状态可能持续数年甚至更久。

“隐性悬浮型”悬浮的根源在于“价值认同危机”与“生活惯性”的叠加:一是教育与职业的脱节,部分青年在大学期间所学专业与兴趣不符,毕业后为追求稳定进入不适合的岗位,长期从事与自身能力、兴趣相悖的工作,导致职业认同感缺失;二是传统生活路径的束缚,部分青年按照“标准化”人生轨迹生活,却从未思考过自身真正的

需求,最终陷入“为他人而活”的困境;三是社会竞争压力的异化,部分青年在长期高强度的竞争中感到疲惫,于是选择“躺平”式稳定,通过放弃目标追求缓解压力,却在此过程中失去了精神寄托,陷入悬浮。此外,社交媒体的“拟态环境”也加剧了隐性悬浮,青年在社交媒体上频繁接触到他人“光鲜亮丽”的生活,与自身“表面稳定、内心空虚”的状态形成对比,进一步强化了焦虑感与疏离感。

二、青年悬浮期的“合”:弱自主性的共性表现

尽管青年悬浮期群体可划分为“主动选择型”“被动滞留型”“半悬浮型”“隐性悬浮型”,且各类群体在悬浮主动性、行为策略上存在差异,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所有类型的悬浮青年在自主性层面均存在明显短板,其“自我的弱化体现为世界的延展”^[156],表现为对外部因素的过度依赖、行动与目标的割裂以及自我认同的混乱。这些弱自主性的共性特征,构成了青年悬浮期的“合”性,成为制约青年从“悬浮”走向“扎根”的关键障碍。

(一)决策依赖:从“他者导向”到“路径模糊”

决策自主性是个体自主性的核心体现,而在青年悬浮期,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滞留”的青年,均普遍存在决策依赖问题。这种决策依赖并非单一表现,而是呈现出从“他者导向”到“路径模糊”的递进逻辑,贯穿于青年职业选择、生活规划等关键决策环节。

从“他者导向”的表现来看,青年的决策往往受家庭、社会观念与同辈群体的多重影响,难以完全基于自身需求作出选择。对于“被动滞留型”青年而言,家庭经济条件、父母认知水平直接限制其决策空间——部

分来自农村或低收入家庭的青年,因父母缺乏对新兴职业的认知,往往被要求选择“稳定”的传统行业,即使自身对这些行业缺乏兴趣,也因经济依赖被迫接受;而“主动选择型”青年看似拥有决策自主权,实则仍受社会观念与同辈压力的影响,部分青年选择“间隔年”、自由职业,并非完全出于自我意愿,而是受社交媒体上“多元人生”“拒绝内卷”等潮流影响,将他人的生活方式视为自身决策的标准;“半悬浮型”青年则在家庭期望与个人追求之间摇摆,父母对稳定工作的坚持与自身对副业发展的渴望相冲突,最终导致决策犹豫,既不敢彻底放弃稳定工作,也无法全力投入个人追求。

“他者导向”的直接后果是青年发展“路径模糊”,即无法形成清晰、可持续的发展规划。一方面,过度依赖他者决策的青年,由于缺乏对自身能力、兴趣的深入认知,难以判断所选路径是否适合自己。部分青年在父母建议下选择“铁饭碗”工作,入职后发现自身性格、能力与岗位需求严重不符,却因“稳定”的外部评价不敢轻易离职,陷入“做不喜欢的工作—缺乏动力—职业发展停滞”的闭环;另一方面,受外部标准影响的决策往往具有强时效性,当社会观念、同辈选择发生变化时,青年的决策容易动摇,导致发展路径频繁调整。此外,数字时代的信息过载进一步加剧了决策依赖。青年在面临职业选择、生活规划时,可通过网络获取海量信息与他人经验,但这些信息往往是碎片化的且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如“考公稳定但收入低”“创业自由但风险高”,青年缺乏筛选、整合信息的能力,容易陷入“选择焦虑”,最终转而依赖他人决策,进一步丧失自主性。

(二)行动空转:目标与实践的断裂

行动自主性是将目标转化为现实的关

键,而在青年悬浮期,各类悬浮青年普遍存在“行动空转”现象,即虽有明确或模糊的目标,但在实践层面缺乏有效的行动支撑,导致目标与实践严重断裂,最终无法实现预期成果,陷入“想做却做不到”的困境。这种行动空转并非单纯的“懒惰”,而是源于行动力不足、规划不合理与外部干扰等多重因素的叠加。

从目标与实践断裂的具体表现来看,不同类型的悬浮青年呈现出不同的行动空转特征,但本质上均缺乏将目标落地的能力。“主动选择型”青年虽有探索多元路径的目标,却常因“试错”缺乏规划而陷入行动空转;“被动滞留型”青年的行动空转则表现为“有改变意愿却无行动能力”,其大多渴望摆脱低质量就业状态,有“提升技能”“寻找更好工作”的目标,但受限于经济条件、时间精力与自我效能感,难以将对目标的追求转化为实践中的动力;“半悬浮型”青年的行动空转则体现在“目标分散”与“目标缺失”上,其同时追求“主业稳定”与“副业发展”,但由于时间、精力分配不合理,往往顾此失彼;“隐性悬浮型”青年则因缺乏清晰的价值追求,处于“无目标”或“目标模糊”状态,虽有“改变现状”的想法,却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形成“行动空转—精神空虚—更依赖低质量娱乐”的闭环。

(三)价值悬浮:自我认同的碎片化

价值自主性是个体形成稳定自我认同、明确人生意义的基础,而在青年悬浮期,各类悬浮青年均面临“价值悬浮”问题,即无法形成统一、稳定的价值体系,自我认同呈现碎片化特征,表现为对“成功”“幸福”“自我价值”的认知混乱,难以在生活、工作中找到归属感与价值感。“正因为‘悬浮’之后,自己当下的行为本身不能产生意义”^[3240],这种价值悬浮不仅影响青年的心理,还会

进一步加剧决策依赖与行动空转,形成恶性循环。

从自我认同碎片化的表现来看,青年在价值认知上呈现出矛盾化、易变等特征。一方面,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价值观念的冲突,使青年陷入认知混乱。在职业价值认知上,传统观念强调“稳定”“社会地位”,现代观念追求“自由”“自我实现”,部分青年既渴望像父母一样拥有稳定工作,又羡慕自由职业者的生活方式,导致对职业价值的认知矛盾;在生活价值认知上,传统观念重视“家庭”“婚姻”,现代观念强调“个人体验”“延迟结婚”,青年在家庭压力与个人需求之间摇摆,难以确定生活的核心目标。另一方面,社交媒体构建的“拟态环境”进一步加剧了价值悬浮。青年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频繁接触到多元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如“95后CEO年入百万”“00后环游世界”“躺平青年拒绝内卷”,这些信息往往经过美化,缺乏真实背景,容易让青年产生“他人都在成功,只有自己在悬浮”的焦虑。同时,不同信息传递的价值观念可能相互冲突,如有的内容鼓励“努力奋斗”,有的内容宣扬“躺平即正义”,青年缺乏对这些观念的辨别能力,容易被外界声音左右,导致自我认同随信息变化而摇摆。

不同类型的悬浮青年,其价值悬浮的侧重点虽有差异,但本质上均缺乏自我认同的“锚点”。“主动选择型”青年虽追求“自我实现”,却将自我实现等同于他人认可,通过外界来定义自身价值,一旦外部指标未达预期,便会陷入自我怀疑;“被动滞留型”青年则因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容易将“自我价值”与社会地位、收入水平绑定,认为自身收入低、职业不稳定,便是“失败的”,从而否定自我价值;“半悬浮型”青年在“稳定”与“自由”的拉扯中,无法确定自身价值

的核心来源,既因稳定工作而获得安全感,又因无法实现个人追求而感到价值缺失;“隐性悬浮型”青年则完全丧失价值锚点,对工作、生活均缺乏热情,认为“无论怎样生活都一样”,陷入虚无主义,自我认同彻底碎片化。

三、青年悬浮期“分”与“合”的成因:结构约束与个体适应的交织

“社会的变迁导致了人类心理内部的转化。”^[155] 青年悬浮期的“分”与“合”作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其形成根源在于社会结构对青年发展的约束以及青年在应对约束时的个体适应差异。宏观层面的社会转型重塑了青年的发展环境,既提供多元机会,也带来普遍风险,成为“分”与“合”的基础;中观层面的家庭与社会网络支持差异,使青年在资源获取上呈现分化,加剧群体类型差异;微观层面的个体资本与心理韧性不同,导致青年适应能力分化,同时也因个体能力不足催生弱自主性的共性。

(一)宏观结构:社会转型中的机会与风险并存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经济结构调整、就业市场变革、价值观念多元等宏观因素,为青年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也带来了普遍存在的风险,这种“机会与风险并存”的格局,是青年群体动态分化的重要原因。

从“机会供给”来看,社会转型为青年提供了多元发展路径,成为群体分化的基础。一方面,经济结构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数字经济等转型,催生了大量新兴职业,这些职业打破了传统职业的稳定性、层级性等特征,为青年提供了“不依赖传统路径也能成功”的机会。拥有专业技能、敢于尝试的青年,可通过这些新兴职业实现自我发展,而缺乏相关技能、观念保守的青年,则

难以抓住机会,只能局限于传统低技能岗位,导致群体在职业选择上出现分化。另一方面,社会流动渠道的多样化,使青年有更多机会突破阶层限制。教育普及让更多普通家庭出身的青年有机会进入高校,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互联网技术降低了创业门槛,普通青年也可通过低成本创业实现阶层跃升,但这种机会并非均等的,不同地区、不同家庭背景的青年在机会获取上存在差异,进一步加剧了群体分化。

从“风险挑战”来看,社会转型带来的不确定性,成为弱自主性共性形成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加剧群体分化。其一,就业市场的不稳定性显著增强。经济结构调整导致部分传统行业萎缩,新兴行业则因发展迅速而波动较大,无论是传统岗位还是新兴岗位,都难以提供长期稳定的就业保障,使青年普遍面临“就业不稳定”的风险。这种风险导致青年在职业选择与决策上更加谨慎,缺乏独立判断的勇气,容易依赖他人意见,形成“决策依赖”的弱自主性特征。其二,社会竞争的异化加剧了青年的焦虑。随着教育普及,高学历人才数量激增,“学历内卷”现象严重,青年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不得不投入更多时间、精力提升学历、考取证书,但过度竞争反而使青年迷失方向,不清楚自身真正需求,陷入“为竞争而竞争”的状态,导致“价值悬浮”的弱自主性特征。此外,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青年缺乏统一的价值指引,在成功标准、生活方式等的选择上陷入混乱,进一步强化了弱自主性共性。

(二)中观支持:家庭与社会网络的差异化供给

中观层面的家庭与社会网络,是青年获取资源、应对风险的重要支撑。然而,不同青年在家庭背景、社会网络等方面的质量

上存在显著差异,导致资源供给呈现差异化特征。这种差异化供给,既是青年群体动态分化的关键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弱自主性共性的形成。

家庭支持的差异化,直接导致青年悬浮类型的分化。家庭支持主要包括经济支持、信息支持与情感支持三个维度,不同维度的支持差异,对青年发展产生不同影响。在经济支持方面,富裕家庭能够为青年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使其有条件进行试错;而贫困家庭难以提供经济支持,青年为生计被迫进入低质量岗位,成为“被动滞留型”。在信息支持方面,拥有优质社会资源的家庭,能够为青年提供行业信息、优质岗位的就业信息等,帮助青年明确职业方向;而普通家庭缺乏此类资源,出身于普通家庭的青年只能通过网络、招聘平台获取碎片化信息,容易陷入“决策依赖”。在情感支持方面,开明家庭能够尊重青年的选择,为其提供情感鼓励,帮助青年应对挫折;而控制型家庭过度干预青年的决策,导致青年缺乏自主意识,容易形成“价值悬浮”。

社会网络支持的差异化,进一步加剧了群体分化。社会网络是青年获取资源的重要补充,其质量与结构,直接影响青年的发展机会。“主动选择型”青年与“半悬浮型”青年,往往拥有异质性强、资源丰富的社会网络,能够获取多元信息、合作机会,为其试错、发展副业提供支持;而“被动滞留型”青年的社会网络多为同乡、同事,成员职业层次低、资源有限,难以提供有价值的发展机会,反而可能传递“努力无用”的消极观念,加剧其“行动空转”;“隐性悬浮型”青年则因社交圈狭窄、缺乏深度互动,难以获得情感支持与价值认同,进一步强化了“价值悬浮”。

(三)微观应对:个体资本与心理韧性的

差异

在相同的宏观结构约束与中观支持条件下,青年的个体适应能力不同,也会导致悬浮期的“分”与“合”。个体适应能力主要体现在个体资本与心理韧性两个方面,两者的差异既是群体分化的重要原因,也因普遍存在的能力不足,催生弱自主性共性。

个体资本的差异直接导致青年在资源获取与利用上的分化,进而形成不同悬浮类型。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学历、技能、知识等,是青年参与社会竞争的核心资本。高人力资本青年,在就业市场中更具竞争力,能够获得优质岗位或多元发展机会,容易成为“主动选择型”或“半悬浮型”;而低人力资本青年,只能从事低技能、低薪酬工作,容易成为“被动滞留型”。其中,拥有技能的青年,可选择进入大企业工作、从事自由职业或创业,而缺乏技能的青年,只能从事临时性工作。社会资本主要指个体通过社会网络获取资源的能力,高社会资本青年,能够利用网络获取信息、机会,为其发展提供支持;而低社会资本青年,难以获取有效资源,进一步限制了发展空间。

心理韧性的差异影响青年应对挫折、适应变化的能力,加剧群体分化。心理韧性强的青年,在面对就业失败、职业迷茫等困境时,能够保持积极心态,主动调整策略。如“主动选择型”青年在创业失败后,能够总结经验、重新尝试;而心理韧性弱的青年,在遭遇挫折后容易陷入消极情绪之中,放弃努力;“被动滞留型”青年在求职失败后,可能选择“躺平”,陷入“行动空转”;“隐性悬浮型”青年则因心理韧性不足,无法应对工作、生活中的压力,陷入“价值悬浮”。

四、超越悬浮:从“弱自主”到“强自主”的路径探索

青年作为社会中最有生气、最有闯劲的

群体,“蕴含着改造客观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无穷力量。”^{[4][133]}其悬浮期并非难以挣脱的“成长桎梏”,而是个体从“依赖”走向“独立”的重要过渡阶段。要实现从“弱自主”到“强自主”的转变,需要社会、家庭学校、个体形成合力,从制度保障、环境营造、能力培育三个维度构建支持体系,赋予青年自主发展的底气、空间与能力,最终帮助其超越悬浮,实现扎根成长。

(一)社会层面:构建更包容的“过渡支持体系”

青年的自主性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的支撑,尤其是在悬浮期这一脆弱阶段,要“引导社会各方面关心青年、服务青年,积极做好青年工作,为广大青年成长成才、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环境。”^[5]社会需打破将青年悬浮简单归为负面状态的标签化认知,构建更包容、更具支持性的“过渡支持体系”,从物质保障、就业服务、价值引导三个方面,为青年实现自主发展破除各类壁垒。

在物质与社会保障层面,需降低青年悬浮期的生存压力,为其提供“试错缓冲带”。一方面,要完善针对青年的临时性社会保障政策,如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覆盖范围,允许青年在悬浮期以较低缴费标准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避免就业不稳定导致社保断缴;另一方面,要加大对低收入悬浮青年的扶持力度,通过发放就业补贴、提供廉租房等方式,缓解其生活压力。此外,还应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青年支持,如设立青年创业基金、公益实习平台,为“主动选择型”青年提供资金支持与实践机会,降低其试错风险。

在就业服务层面,需针对不同类型悬浮青年的需求,提供精准化、个性化的就业指导。对于“被动滞留型”青年,应聚焦技能提升与岗位匹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为其提供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并与企业合作搭建“培训—就业”对接平台,帮助其实现高质量就业;对于“主动选择型”青年与“半悬浮型”青年,应提供多元化的职业发展服务,帮助其明确发展方向、规避行业风险;对于“隐性悬浮型”青年,可通过职业心理咨询服务,帮助其消除职业困惑、重塑职业认同,找到工作与自我价值的结合点。同时,还需打破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壁垒,如放宽部分职业的户籍限制、消除学历歧视,为青年提供更公平的就业机会,减少外部环境限制导致的被动悬浮。

在价值引导层面,需构建多元包容的社会价值体系,打破“单一成功标准”对青年的束缚。社会媒体应减少对“速成成功”“完美人生”的过度渲染,转而传播真实、多元的青年成长故事;政府与社会组织可通过举办“青年成长论坛”“多元职业展”等活动,展示不同职业的价值与魅力,引导青年树立“职业无高低、价值有大小”的观念。此外,还需加强对青年悬浮期的正面宣传,将其定义为青年“探索自我、积累经验”的正常成长阶段,减少社会对悬浮青年的偏见,为青年自主发展营造宽松的舆论环境。

(二)家庭与学校:从“包办代替”到“适度放手”

家庭与学校是培育青年自主性的“第一课堂”,长期以来,“包办代替”的教育模式导致青年缺乏独立决策、自我管理的能力。要帮助青年超越悬浮,家庭与学校需转变教育理念与行为模式,从“过度保护”转向“适度放手”,将自主发展的权利还给青年,在实践中培养其自主性。

家庭层面需重塑亲子关系,家长要从控制者转变为支持者。其一,“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4][133]},父母应尊重青年的自主选择,减少对其职业、生活的过度干预。其中,

在职业选择上,父母应避免以“稳定”“体面”为标准强迫青年选择“铁饭碗”,而应通过沟通了解青年的兴趣与规划,提供参考意见而非替其做决定;在生活规划上,父母应允许青年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如“间隔年”、自由职业,即使青年的选择可能面临风险,也应给予理解与支持,而非一味否定。其二,家庭应培养青年的责任意识,让其在承担责任中提升自主性,对于已进入职场的青年,父母应减少经济上的过度支持,鼓励其通过自身努力解决生活问题,避免因“经济依赖”导致决策受限。其三,家庭应加强与青年的平等沟通,而非单向说教。父母可主动倾听青年的困惑与压力,分享自身的成长经验而非灌输“正确答案”,帮助青年在沟通中梳理思路、明确目标,而非直接为其解决问题。

学校层面需改革教育体系,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培养,将自主性培育融入教育全过程。在基础教育阶段,应注重培养青年的独立思考能力与自我管理能力,可开设“生涯规划课程”,引导学生从初中、高中阶段开始探索自身兴趣、能力,了解不同职业的要求,为未来决策积累基础认知。在高等教育阶段,需加强“实践教学”与“职业指导”的衔接。高校可增加实习、实训课程的比重,要求学生在毕业前完成一定时长的企业实习,通过真实职场体验提升行动能力。

(三)个体层面:在悬浮中培育“渐进式自主”

外部支持体系的构建为青年自主性发展提供了条件,但“一个人成长成才,内因起决定作用。”^{[41][40]} 青年最终实现从“弱自主”到“强自主”的转变,仍需依赖自身的主动探索。青年应正视悬浮期的价值,将其视为培育自主性的“实验场”,通过“渐进式自主”的路径,逐步提升决策、行动与价值认

同能力,最终突破悬浮困境。

青年需从“小决策”入手,逐步提升决策自主性,打破“决策依赖”的惯性。对于长期依赖他人决策的青年,可先从生活中的小事开始自主选择,如“周末去哪里旅行”“选择哪门线上课程”,在选择过程中学会分析自身需求、评估选项利弊,积累决策经验;在职业决策上,可采用“分步探索”的方式,而非追求“一步到位”。青年若对某一行业感兴趣,可先通过兼职、实习的方式深入了解,再根据实践体验决定是否进入该行业,避免盲目决策。同时,青年还需培养信息筛选能力,面对海量信息时,学会辨别信息的真实性与适用性,结合自身情况作出判断,而非被他人意见或网络潮流左右。

在行动层面,青年需建立“目标—计划—执行—反思”的观念,破解“行动空转”问题。其一,应制定“具体、可行”的目标,避免模糊化的空想。其二,需将目标拆解为阶段性计划,并设定明确的时间节点,通过“小目标的实现”积累行动力。其三,要养成反思的习惯,每周或每月回顾计划执行情况,分析未完成的原因,并及时调整策略,在“实践—反思—调整”的过程中提升行动自主性。

在价值层面,青年需通过深度探索与主动建构,形成稳定的自我认同,摆脱“价值悬浮”。一方面,可通过多元实践探索自我价值,如参与公益活动、尝试不同类型的工作,在实践中感受“帮助他人的快乐”“完成任务的成就感”等,逐步明确自身的价值维度;另一方面,需学会辩证看待外部评价,既不盲目否定他人的意见,也不将他人的标准视为唯一准则,而是结合自身实践体验,形成独立的价值判断。此外,青年还需培养“自我接纳能力”,接受自身的不完美与悬浮期的不确定性,(下转第 32 页)

行政效能提升：“十四五”回顾与 “十五五”展望

刘雅静

(宁夏区委党校,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提升行政效能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议题,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十四五”时期,我国在政务服务渠道整合、服务模式优化与数字技术赋能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行政效能实现系统性跃升。“十五五”时期,行政效能提升仍将面临政策执行梗阻、效能转化与公众获得感脱节、数智赋能深度不足等新挑战。未来需通过构建协同高效的体制机制、强化公众需求导向的服务优化、促进数智技术与行政体系的深度融合,推动行政效能从效率提升向价值重构转型,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治理基础。

[关键词]行政效能 “十四五” “十五五” “高效办成一件事”

一、引言

提升行政效能是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核心目标,更是以高质量治理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从“放管服”改革聚焦行政审批权下放,到“最多跑一次”改革优化简化办事流程,再到“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牵引行政体制系统性重塑,行政效能提升的维度得以不断拓展。“十四五”时期,在数字技术加速渗透与国家战略的持续推动下,行政效能提升进入了数智驱动、场景创新、全域协同的新阶

段。2024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 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管理机制和常态化推进机制”^[1],为行政效能提升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引。然而,伴随着治理环境的日趋复杂化、社会公众需求的日益多元化,“十五五”时期行政效能提升将面临制度适配、技术伦理与社会认同等多重挑战。鉴于此,本文将在系统梳理“十四五”时期行政效能提升核心成就的基础上,深入剖析“十五五”时

收稿日期:2025-09-21

作者简介:刘雅静,中共宁夏区委党校决策咨询部(研究室)教授。

期将面临的突出挑战,提出针对性的优化路径,为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供必要的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二、“十四五”时期行政效能提升的实践探索与核心成就

“十四五”时期,我国行政效能提升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改革抓手,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支撑,在政务服务渠道、服务模式、治理工具这三大维度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构建起线上线下融合、供需精准对接、数智深度赋能的行政效能提升新格局。

(一)政务服务渠道:从分散供给到一体化整合

“十四五”时期,我国政务服务渠道体系完成了从单点优化到系统集成的转型,初步实现了泛在可及、智慧便捷的服务目标,这一转型既源自政府对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需求的精准回应,也彰显了治理理念与思维的转型升级。其一,就线上渠道而言,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作为总枢纽的作用得到持续强化,基本建成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体系,政务服务全流程在线办理能力得以大幅提升。截至2025年6月,各省网页端“高效办成一件事”前三批重点事项总落实率达83.14%,移动端总落实率为53.50%,其中第一批事项在网页端和移动端的落实率分别为98.32%和71.63%^[2],这些实打实的数据表明线上政务服务已实现了从“可用”向“好用”的升级。同时,省级政务服务渠道进一步延伸至各类政务App、第三方小程序等平台,有效满足了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指尖办”“随身办”的现实需求。其二,就线下渠道而言,县级以上政务服务中心全面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的综合窗口模式,这一模式改变了以往“一事一窗、多头受理”的碎片化格局,大幅提升了线下服务效

率。同时,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便民服务站实现了全覆盖,而且通过与邮政、银行等网点合作,构建了“15分钟政务服务圈”,让公众“在家门口办成事”的期待变为现实。其三,线上与线下渠道实现了无缝对接。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各地打破数据孤岛,通过对原有平台和系统的有机整合,实现了政务服务统一入口、统一受理、统一出件,减少重复录入,形成了标准统一、体验一致的服务闭环。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线上线下并行,而是通过数据互通、流程协同,构建起“线上申请-线下核验-线上反馈”的全链条服务模式,如企业开办事项,申请人可在线上提交材料,线下窗口完成身份核验后,线上即时生成营业执照,实现一次跑动、全程办结。

(二)服务模式创新:从事项办理到场景服务

“十四五”时期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核心的服务模式创新,有效推动了行政效能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的转型,实现了政务服务体系的系统性重构,这一转型和重构既是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超越,也标志着公共管理理念层面的重大革新。具体而言,其一,“一件事一次办”改革成为政务服务模式创新的核心载体。这一改革立足于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全生命周期需求,将若干个关联性强、办理量大的事项集成整合为“一件事”,构建了“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的集成化服务机制。从实践来看,企业注销、二手房交易等高频事项通过流程再造,办理环节平均压缩60%以上。其二,跨省通办机制的建立打破了地域壁垒,成为服务模式创新的重要突破成果。依托于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企业登记、社保卡

申领、户口迁移等 130 余项高频事项实现了跨省通办,借助两地联办、远程帮办等模式,有效解决了公众“异地跑、多次跑”的问题。同时,部分地区还探索建立跨省通办专窗,如长三角地区设立“一网通办”专窗,实现区域内政务服务事项的无差别受理,进一步提升了跨区域政务服务的便捷性。其三,关联事项集成办重构了业务逻辑,体现了服务模式创新的深度延伸。此项改革以“办成一件事”为目标,明确牵头部门与配合部门的职责,有效推动了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如北京市西城区从服务对象的视角出发,创建专区,畅通“一门、一网、一线”服务渠道,将涉及多个部门的民生事项整合到专区办理,并配备专门帮办人员,为社会公众提供全流程精准指引;深圳市龙华区借助“政策 AI 计算器”,实现了惠企补贴政策的智能拆解、精准匹配与一键直申,同时通过“龙华 GPT 智能客服”为用户提供集政策汇聚、信息融合、便民引导为一体的集成服务,显著提升了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办事的智能化程度。这些案例表明,关联事项集成办已从最初的事项合并逐步向流程再造、服务重构转化,真正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

(三)数字技术赋能:从工具应用到治理重塑

“十四五”时期,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的深度嵌入,推动行政效能提升从技术辅助向系统赋能跃迁,这一跃迁不仅改变了政务服务的供给方式,而且重塑了政府的组织结构与治理逻辑。其一,以数据驱动实现精准治理。政务数据共享从物理连通向逻辑贯通升级,大数据分析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政务服务大厅运营管理、政府决策与风险预警领域。如浙江省杭州市在建设“城市大脑”的过程

中,借助阿里云的人工智能技术,以数据为核心,依托科学算法、智能建模、深度学习和快速分析,实时呈现数据分析结果,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3];北京市“未诉先办”平台依托数据挖掘技术,精准识别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诉求热点,有效推动治理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判转型。其二,以智能化服务持续优化用户体验。用户画像、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的应用有效推动了政务服务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的转变^[4]。杭州市临平区推出的人工智能助手“临小爱”,能够为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提供“一件事”办理流程的智能问答服务,而且可以精准识别用户意图,提供个性化指引,减少了企业和群众因不熟悉流程而导致的办事延误;宁夏银川市“一枚印章管数据”改革通过对各个系统、部门数据平台的打通与整合,创新数据共享应用方式,使企业和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如企业申请经营许可时系统可自动调用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的历史数据,无需企业重复提交,实现了“无感审批”。其三,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公共支撑体系持续完善,为数字技术赋能行政效能提供了坚实基础。统一的电子印章、电子证照、身份认证系统已基本建成,有力推动了国务院各部门的垂直管理系统与地方相应平台的深度精准对接,实现了条块系统的有机融合与互联互通。如电子证照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使社会公众办理社保、医疗等事项时,无需携带实体证件,通过手机出示电子证照即可完成核验,大幅提升了办事的便捷性。

三、“十五五”时期提升行政效能将面临的突出挑战

作为一个动态、复杂的系统工程,行政效能提升在“十四五”时期取得显著成就,

但进入“十五五”时期,随着治理环境的日趋复杂、技术应用的逐步深化与社会公众需求的持续升级,行政效能提升仍将面临若干维度的核心挑战,制约其从效率提升向价值增益的深层转型。

(一) 政策执行维度存在传导失灵与协同不足的系统性梗阻

“十五五”时期,政策执行将面临隐蔽性更强、根源更系统的梗阻问题,进而制约行政效能的整体释放,这一问题的本质是科层体制的结构性矛盾与治理环境复杂性之间的冲突。

其一,从纵向传导来看,上级政策与基层落实的传导断层问题较为突出。一是在压力型体制影响下,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层层加码”与“层层过滤”并存的双重异化现象。一方面,各级政府为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任务,会在政策压力分解过程中主动或被动加码^①,这种做法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在追求更高的执行标准,实质上则是对常规性执行要求的异化,致使政策在逐级落实过程中脱离了基层实际。如中央提出“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要因地制宜推进,但部分省级政府为追求率先完成,将改革任务细化为短期内实现所有事项集成办,导致市、县(区)政府为达标而采取形式主义做法,将原本无需集成的事项强行合并,增加了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理解难度与办理难度。另一方面,基层政府为规避风险,又会采用选择性、变通性执行的方式消解自身压力,尤其是在面临海量政策文本时,基层往往会通过选择性关注策略进行信息过滤,倾向于对低风险、易量化的政策要求优先响应,而忽视那些更为复杂或高风险的事项,进而引致政策的响应延迟与传导失真。如在“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中,基层政府优先落实企业开办、社保缴

纳等易量化的事项,而对涉及多部门协同、矛盾化解的复杂事项则暂缓推进。二是政府层级过多与激励机制的相对缺失,进一步加剧了基层响应的迟滞状况。一方面,相较于其他国家和地区采用的三级政府架构,我国政府组织结构的层级更多,省级政府与基层政府之间存在多个中间层级^②,这一结构性因素的负面影响在问责法治化背景下被急剧放大,使得公共政策在层级传递过程中更易产生速度衰减、响应迟滞等问题,使得基层政府的执行态度从怕完不成任务转向避免担责任。另一方面,当前在基层政府层面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与必要的反馈渠道,加之政策执行的监督与评估机制也不够健全,容易引发基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更多的随意性与变通性行为,进而使政策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其二,从横向协同来看,政策执行主体间协同不畅问题显著。一方面,职责同构导致的部门间职责不清、职能配置失衡,成为影响政策执行主体间协同能力的关键制约因素。在“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中,尽管明确了牵头部门与配合部门的职责,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部门利益思维,配合部门往往缺乏协同积极性。如在企业注销“一件事”中,税务部门因担心税收征管风险,不愿及时共享企业税务注销信息,导致市场监管部门无法及时为企业办理注销登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改革成效。另一方面,跨部门的数据实时共享机制建设亟待进一步健全完善。有的地方政府和部门受制于整体性治理理念的缺失,缺乏打通部门间信息系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无法实时共享数据导致跨部门信息传递存在滞后或失真现象,进而使部门各自为政,难以形成行政效能优化的合力。如在新生儿出生“一件事”中,卫健部门的出生医学证明数据、公

安部门的户口登记数据和医保部门的参保数据等无法实时共通共享,导致群众需在多个部门间重复提交材料,影响了“一件事一次办”的效率和效果。

(二) 效能转化维度存在公众获得感与效能提升脱节的现实难题

行政效能提升的终极目标是增强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获得感,但其获得感并不局限于制度设计与服务供给,更来源于其在价值层面对于政务服务相关决策的参与度与认可度。“十五五”时期,因公众参与的形式化与政务服务便利化短板的并存,行政效能提升与社会公众感知之间可能出现“剪刀差”,进而影响到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其一,公众参与治理形式化问题凸显是效能转化不畅的重要原因。尽管数字技术进一步拓宽了社会公众的参与渠道,但部分地区将公众参与视为政策装饰而非共治平台,存在算法筛选意见、象征性参与等现象,导致公众意见难以对政策制定产生实质性影响。如部分地方政府在制定“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清单时,虽采用了网络问卷或其他形式征求公众意见,但受制于算法筛选,最终仅呈现出符合政府预期的意见,而忽视了社会公众的真实意愿和诉求。其二,社会公众参与能力不足进一步削弱了参与效果。公众参与能力若得不到系统性提升,缺乏参与各类行政事务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则难以对复杂政策进行有效反馈,进而使其参与往往只能停留于表面,同时,在参与过程中也难以形成有效的利益表达和协商格局。如在产业政策补贴“一件事”改革中,公众因缺乏对产业政策、补贴标准等的专业化理解,无法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导致其参与流于形式,使得最终出台的改革方案有可能难以精准匹配企业需求。其三,政务服务便利化方面仍存在明显短

板。线上线下服务协同不足,部分事项线上线下要求不一致,增加了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办事负担。如部分地区存在线上、线下办事要求的材料不一致问题,甚至要求线下办理时必须先在线上预约或提交申请材料,增添了不必要的办事环节和负担。其四,数据共享不充分导致“一网通办”难以覆盖政务服务全流程。政务服务的便利化依赖于数据的高效共享和协同,但目前仍存在政务数据共享不充分等问题。如当前医保、公积金等系统虽已完成与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的对接,但受到数据采集与接入标准不统一、数据权限划分不清晰以及风险防控机制不完善等因素影响,实际运行中常会出现技术接入而数据不通的局面^[7],导致“一网通办”只能停留于在线申请环节,后续的审批、核验等仍需线下办理,无法实现全流程在线办理。其五,城乡、区域间政务服务能力差距显著,边远地区、农村地区服务可及性不足。部分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西部边远地区因网络基础设施薄弱,网速慢、信号差,群众无法顺畅使用线上政务服务。同时,因基层政务服务人员数量不足及专业能力有限,无法为群众提供有效的在线办事指导,导致农村群众仍需长途奔波、到县城办理政务事项。

(三) 数智赋能维度存在技术依赖与治理异化的双重困境

“十五五”时期,因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的脱节,数智技术赋能行政效能仍将面临工具理性膨胀与价值理性缺失的双重困境,进而制约治理效能的深层释放。具体而言,其一,过度的技术依赖导致治理空转。部分地方政府把数智技术应用简单视为工具层面问题,缺乏对治理逻辑的深度思考,片面推崇新技术应用,陷入“技术至上”误区^[8],将数智技术应用等同于治理现代化,

忽视了制度适配与公共价值,无形中增加了治理的复杂性及效率损失。如部分地区过度依赖智能审批系统,取消了人工干预环节,以致出现算法歧视问题,使得小微企业在申请惠企补贴时,系统因企业规模小、信用数据少而自动拒绝,未考虑企业的实际经营困难。同时,部分地方政府将政务服务线上化等同于数智化,仅将线下流程简单搬到线上,未对流程进行优化重构,导致线上跑多次的问题,形成了有技术而无效能的困境。其二,对技术的盲从引发碎片化治理。在将数智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治理的过程中,部分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技术热点,缺乏整体性治理思维,忽视了应用场景与整体治理目标二者间的协同,部门各自开发政务 App、建设数据中台,导致数字化应用场景各自为政、重复建设,公众需下载多个 App 才能办理不同事项,增加了使用的复杂性。此外,部分地方政府盲目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发智能客服系统,但智能客服由于缺乏对相关政务业务的深度理解,无法精准识别用户意图,回答问题流于表面,反而降低了服务效率和质量。其三,数据安全性与隐私保护机制不健全,制约了数智技术赋能的可持续性。目前在公共管理领域,政务数据跨部门共享需求与隐私保护间的矛盾较为突出^[9]。部分地方政府在推动数据共享时,未建立完善的数据安全防护机制,导致数据泄露风险增加。有的地方存在过度采集社会公众信息现象,如在办理简单的政务事项时,也要求采集人脸信息、家庭住址等非必要数据,侵犯了社会公众的隐私,引发公众不满。其四,复合型人才短缺进一步制约了技术赋能。由于缺乏既懂政务业务又精通数智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政府难以对技术方案进行有效的本土化适配与持续性创新,数智技术的

技术优势未能转化为实际效能。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虽引入了大数据分析平台,但由于工作人员缺乏数据清洗、建模分析能力,平台仅用于数据存储,无法为政府决策提供有力支持。另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在开发“高效办成一件事”智能系统时,因技术人员不熟悉政务流程,导致系统功能与实际需求脱节,无法有效提升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

四、“十五五”时期持续提升行政效能的实践路径

(一)构建高效协同的体制机制,破解政策执行的系统性梗阻

以制度创新破解政策执行梗阻,构建上下贯通、横向协同的行政效能提升机制,这一机制的核心是平衡政策刚性与执行弹性,强化部门协同与向基层赋能。其一,进一步优化政策传导机制,确保政策落地不跑偏、不走样。建立政策拆解与动态反馈机制,上级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充分调研基层实际情况,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边界,避免层层加码。具体而言,可建立由国务院办公厅牵头、省级政府统筹、市县(区)政府落实的三级推进机制,在行政效能优化改革过程中,中央制定总体目标与核心原则,省级政府根据区域特点细化实施方案,市县(区)政府则结合当地实际探索具体路径,避免“一刀切”式的政策要求,如此则既能确保改革方向的一致性,又保留了因地制宜的政策实施空间。同时,进一步完善“中央切块、省级细化、备案同意、快速直达”的政策落地流程^[10],减少层级传递中的信息损耗,如可通过召开视频会议、政策解读会等方式,直接向基层政府传达政策精神,避免中间层级的信息失真与扭曲,实现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其二,构建压力与激励并重的执行机制,增强基层

执行动力。将政策执行难度、创新度与公众满意度等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建立健全差异化激励机制,对落实改革成效显著的基层单位及工作人员,给予物质奖励、评优评先等激励;对执行不力的部门及工作人员,进行约谈问责。同时,应建立更为顺畅的基层反馈渠道,让基层政府能够及时反映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与困难,上级政府根据反馈适时调整政策内容、优化改革举措,形成“制定-执行-反馈-优化”的政策闭环,以此推动改革的循序渐进与持续深化。其三,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有效打破部门壁垒,形成治理合力。进一步明晰部门职责边界,破解职责同构困境,建立健全由牵头部门负责、配合部门协同的责任体系,明确牵头部门对改革成效负总责,配合部门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数据共享、流程对接等任务。同时,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进一步加强公共应用支撑体系建设,构建统一的跨部门协同平台,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清单和数据共享责任机制,明确数据共享的范围、方式与时限,推动部门间数据的实时互通,对数据共享不及时、不充分的部门进行问责,确保数据跑腿替代人工跑路。其四,进一步完善公职人员激励机制,激发跨部门协作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根据协同贡献、工作绩效等合理调整薪酬,例如对在跨部门协同中表现突出的公职人员,可给予绩效奖励、晋升优先等激励措施。同时,也可通过建立跨部门交流机制、选派公职人员到配合部门挂职锻炼等方式,增进部门间的理解与信任,有效减少部门协同阻力。

(二)强化公众需求导向,推动行政效能提升从效率优先向价值优先转型

以公众满意为核心,推动行政效能提升从效率优先向价值优先转型,关键是增强

公众参与的实质性与政务服务的便利性,确保行政效能提升优化与社会公众现实需求的精准对接。其一,深化参与式治理改革,让社会公众从旁观者变为真正的参与者。构建开放包容的社会公众参与平台,确保公众意见能够实质性影响政策制定,如在制定“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清单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征求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意见,对其提出的合理化建议,明确采纳情况与反馈时限,避免形式化参与。同时,要保障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自由选择具体事项单独办理或集成办理的权利,这一理念可延伸至公众参与领域,让社会公众自主选择参与方式与参与内容,进一步提升参与的主动性和实效性。其二,建立学校、社会组织、社区三位一体的参与能力培养体系,有效提升公众参与能力。学校教育可通过开设公共管理相关选修课程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与能力;社会组织可通过举办政务参与培训班等形式,帮助公众了解公共政策的制定流程,掌握必要的意见表达技巧;社区则可面向居民组织各类模拟议事会,让公众在实践中逐步提升参与能力。其三,推动政府角色从管理者向协调者转型,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机制,形成共治合力。如在“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中,政府部门可邀请企业代表、行业协会专家参与事项清单制定与流程设计,确保改革方案符合企业实际需求;社会组织可协助政府开展政策宣传、意见收集等工作,提升社会公众参与的广泛性与有效性。其四,推进政务服务线上高效化与操作便利化的有机融合,让公众“好办事、办好事”。推动线上线下服务的深度融合,实现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统一线上线下办事材料清单与受理标准,避免线上一套、线下一套。建立线

上线下联动机制,线上申请材料不全时,线下窗口可协助补充,同时,线下办理事项也可在线上查询进度。其五,加强农村、边远地区政务服务能力建设,推进政务服务的基本均等化。依托“东数西算”工程,进一步优化西部边远地区、农村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网速与信号质量^[1]。在乡镇、村设立政务服务站点,配备便携式政务终端,让群众在家门口办成事。选派优秀政务服务人员到农村地区挂职,对现有人员定期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农村基层政务服务能力。

(三)深化数智技术赋能,实现技术向善与治理提质的双重目标

以技术、制度、主体、社会的四维协同为框架,推动数智技术深度融入行政体系,有效释放治理效能,这一框架的核心是平衡技术创新与风险防控,实现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的有机融合。其一,优化技术底座,破解技术黑箱,确保技术应用的安全、透明、可控。推进算法可解释性建设,将法律规则、伦理要求嵌入算法设计,建立算法透明化与审计机制,如在智能审批系统中需向申请人展示审批依据与算法逻辑,对算法决策有异议时,可申请人工复核。建立第三方算法评估机构,定期对政务领域的算法进行公平性、安全性评估。其二,构建分级分类的数据治理体系,实现数据共享与隐私保护的有效平衡。明确核心数据、通用数据、公开数据等不同级别数据的共享范围与保护措施,如人脸信息、医疗记录等核心数据仅在特定场景下共享,需严格审批;政策文件、办事指南等公开数据向社会开放,方便公众查询。建立全方位的数据安全机制,采用访问控制、数据加密、日志审计等技术手段,实现数据从采集、存储、使用到销毁的全流程安全防护,有效降低数据

泄露风险。其三,推动技术场景适配,提升技术赋能的有效性与精准性。针对企业开办、社保缴纳等高频事项开发轻量化模型,通过模型压缩技术,降低响应时间与服务成本,确保公众快速办、便捷办;针对应急管理、安防监控等高风险领域强化技术加固,运用多技术模态融合机制,提升识别准确率,降低误报率;划定人工智能使用边界,针对户籍注销、行政处罚等涉及公民重大权益变更的事项,必须保留人工终审权,避免算法独裁。其四,进一步完善制度保障体系,更好平衡创新与安全的关系。建立适应性法治体系,缩短立法周期,通过中央底线规则与地方试点实现制度与技术协同演进。如中央制定人工智能应用的基本伦理准则与安全标准,地方政府根据区域特点开展试点,总结经验后在全国推广。制定统一的数字技术标准体系,包括数据分级分类标准、技术接口规范、算法认证体系,确保跨部门、跨区域数据互通。构建“硬法划底线、软法促创新”的混合治理模式,硬法设定数据安全与技术伦理红线,如《政务数据共享条例》《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明确数据主权归属、算法透明性、责任追溯等不可逾越的底线规则;软法聚焦行为引导激励,借助安全信用评级、税收优惠等工具,激发企业合规经营的内生动力。其五,强化主体赋能,提升公职人员的数字素养与履职能力,实现人机协同。一方面,通过政企学研协同培养机制,鼓励引导高校与政府合作开设数智治理专业,定向培养复合型人才,实现能力供给端与需求端的精准对接与动态适配。另一方面,构建“技术+政务”的交叉培训体系,组织公职人员参加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应用等方面的理论学习与实战培训,培育公务员的技术批判思维,(下转第 56 页)

从“农业‘大包干’”到“农业社会化服务”： 小岗村农村改革的内在机理与实践启示

瞿红霞

(滁州市委党校,安徽 滁州 239000)

[摘要]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其从“农业‘大包干’”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实践历程,深刻诠释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文运用历史比较分析法、田野调查法与政策文本分析法,梳理小岗村改革的实践脉络,分析其“放权赋能—协同服务”的内在逻辑,并提炼出农村改革的实践启示。研究表明,小岗村的农村改革探索不仅验证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一原理,更为当前农村改革提供了实践样本。

[关键词]小岗村 “大包干” 农业社会化服务 生产力 生产关系

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其从“农业‘大包干’”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实践历程,是中国农村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动注脚。1978 年,农业“大包干”以制度创新冲破体制桎梏,激活了农业生产的内生动力;进入新时代,农业社会化服务又以专业化服务破解小农经营与现代农业的矛盾,推动农业生产向规模化、机械化转型。小岗村农村改革,既遵循着“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

原理,也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见与基层群众的实践智慧,为理解中国农村改革的逻辑提供了实践样本。

一、小岗村农村改革的历史嬗变

(一)农业“大包干”:冲破体制桎梏的历史创举

20 世纪 70 年代,“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分配上存在着严重平均主义倾向,这种体制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国家对农

基金项目:2023 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安徽农业‘大托管’赋能乡村振兴路径研究”(立项编号:2023CX105);2025 年滁州市第八届社会科学应用对策研究课题“乡村振兴背景下滁州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对策研究”(立项编号:A2025013)。

收稿日期:2025-09-20

作者简介:瞿红霞,中共滁州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研室副教授。

业的巨大投入,致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都比较缓慢。1978年,还有2.5亿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1]671}。小岗村更是因为地处岗地等原因,成为远近闻名的“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

1978年冬,小岗村18位农民以“生死契约”的勇气,首创“大包干”(包干到户)模式:农户通过承包集体土地等生产资料,获得自主经营权利,在按规定履行向国家缴纳税收、向集体上缴提留等义务后,其余劳动成果均归农户所有。即“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一“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朴素制度设计,通过明确权责利,彻底打破了人民公社体制下平均主义的桎梏,将农民利益与生产付出直接挂钩,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改革首年,小岗村就彻底结束吃国家救济粮和出门讨饭的历史,从“三靠队”一跃成为“冒尖队”。

“大包干”实践成果引发全国关注,中央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在大包干等农业生产责任制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成为农村改革的重大制度成果,成为我们党农村政策的重要基石^{[2]198}。“大包干”的意义不局限于农业领域,其“放权赋能、权责利统一”的改革逻辑,为后来城市企业经营自主权改革、分配制度优化等提供了借鉴,成为撬动中国全面改革的支点,推动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更重要的是,“大包干”以生动实践有力验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重要论断,为改革开放凝聚了共识。

(二)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创新实践

“大包干”在全国推行以来,我国逐步形

成了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经营格局,并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这种经营格局既契合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与农情,又兼顾效率与公平,不仅保障了亿万农民的基本生计,为农村稳定筑牢根基,更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农业生产面临新的挑战: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谁来种地”的困境日益凸显;我国户均耕地面积不足10亩,土地细碎化格局制约规模化经营;小农户技术应用能力薄弱,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对标准化、智能化的需求。

在此背景下,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既要巩固,也要完善。小岗村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为突破口,探索出农业现代化转型升级的新路径。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现状的前提下,由多元化社会经济组织构成的网络体系,它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从产前、产中到产后的全方位服务,旨在满足农业生产全过程的需求,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3]。其核心服务内容有五大类,即农资供应、农机作业、技术指导、信息咨询及农产品加工与销售等。小岗村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多元主体协同,激发农业服务活力。小岗村构建起“公益性+经营性+半公益半经营性”的服务体系:凤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凤阳县小溪河镇农技站免费提供技术指导;中化农业小岗技术服务中心等龙头企业充分发挥自身在技术研发、运营管理及资金储备等方面优势,将数字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引入小岗村;小岗村供销社农事服务中心承接“耕种管收烘卖”全链条服务,形成“政府托底、市场补位、集体衔接”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网络。二是服务内容丰富,覆盖农业全产业链。产

前,服务组织降低农户种子、化肥等采购成本,并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夯实生产基础;产中,依托无人机植保、智能农机集群提升生产效率;产后,围绕农产品流通与增值目标,推进仓储、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尤其是借助电商平台与订单农业拓宽销售渠道。三是服务对象广泛,兼顾各类经营主体。对于小农户,着重解决其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农机设备缺乏、市场对接难等问题;对于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则帮助其拓展上下游业务,实现农产品深加工和品牌化销售。四是模式灵活多样,精准对接多元需求。生产托管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方式之一。小岗村已形成全托管与半托管两种成熟模式。全托管服务是农业经营主体将耕地、播种、病虫害防治、收割等全链条生产环节,一站式委托给服务组织,由其提供标准化、集约化的全程农事服务;半托管则是经营主体根据自身需求,灵活选择耕、种、管、收、储等单个或多个环节的定制化服务。五是机制保障有力,夯实服务发展根基。在联农带农机制方面,小岗村不断创新利益联结机制,以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务工就业等多元形式,推动小农户深度融入现代农业产业链,进一步拓宽了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在服务质量监管机制方面,小岗村对服务主体的农资供应质量、农事操作规范、农产品仓储加工标准等进行严格监督,确保农业社会化服务各环节规范有序。

农业社会化服务改革实践成功将分散小农户嵌入现代农业体系,既筑牢了家庭承包经营的制度根基,又精准破解了劳动力外流、技术推广受阻、生产效率低下等现代农业发展瓶颈。随着农村改革的持续深化,改革红利不断释放。2024年,小岗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48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36500元^[4],是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58倍。

二、小岗村农村改革的内在机理解析

小岗村从“农业‘大包干’”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农村改革历程,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体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契合时,就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发展。小岗村农村改革就是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过程(见表1)。

(一)农业“大包干”的生成逻辑:生产关系与传统农业生产力的适配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指人类在劳动生产过程中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其构成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要素,而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合称为生产资料。其中,劳动者是最具能动性的要素,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劳动资料作为“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5]210},是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劳动对象是劳动者在劳动生产过程中所加工的一切物质资料,既包括自然界天然存在的原材料,也涵盖经人类前期劳动处理过的半成品。从投入—产出的视角进行审视,生产力的进步体现为在相同的要素投入下能获得更多的产出,即生产效率的提升^[6]。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从构成维度看,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关系(所有制),即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制度安排;二是产品的交换关系与分配关系,涉及劳动成果的流通与分配;三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即生产活动中形成的分工协作、管理与被管理等社会关系。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

的核心和基础，其形式和结构决定着整个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制度的性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国农业生产力仍处于“传统型”阶段:劳动者以体力劳动为主,受教育程度较低;劳动资料以畜力、手工工具为主,机械化率很低;劳动对象局限于粮食等单一作物。在这样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不宜进行较大规模的集体经营。换言之,人民公社体制下集中统一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大包干”改革的核心是对生产关系的精准调整:从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着手,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将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分离,将承包经营权下放给农户,实行分户经营,明确“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一分配原则。这种调整并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并没有改变我国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但却改变了

农民与土地、农民与集体的关系。所以,生产关系理顺了,才能推动农业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生成逻辑:新型生产关系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适配

新时代,面对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复杂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并明确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7]。”农业新质生产力结合技术发展和时代变迁的历史潮流,在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基础上,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方面实现新的跃迁,以农业新质劳动者、农业新质劳动资料和农业新质劳动对象等新型要素形成一种全新的农业生产力形态^[8]。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

表 1 小岗村农村改革内在机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动态适配

阶 段	改革前		改革	改革后
	生产力 发展状况	生产关系 不适应性	生产关系 调整举措	调整后生产关系对 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农业 “大包干”	传统农业阶段: 劳动者:文化程度较低,以种地为生,种地需求大; 劳动资料:以畜力为主,机械化水平低; 劳动对象:农作物单一,产出低。	集中统一经营抑制劳动者积极性,生产效率低下。	实行“大包干”,保持集体产权不变,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下放给农户,赋予农户生产经营自主权。	激发劳动者积极性,推动农业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农业社会 化服务	农业新质生产力萌芽: 劳动者:素质提升,结构性短缺; 劳动资料:农业机械设备、农业信息技术广泛使用,机械化、智能化水平提升; 劳动对象:农作物向多元化、跨领域的农产品和附属产品发展。	分散的小农经营与现代农业发展存在矛盾,制约生产效率提升。	开展社会化服务,整合生产要素,将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实现服务适度规模经营,推动生产降本增效,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力,必然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而构建起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农业新质生产力阶段:劳动者文化素质显著提升,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培育 900 多万人次高素质农民,乡村人才队伍不断壮大。高素质农民队伍职业技术水平持续提升,获得农民技术人员职称、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为 62.86%和 24.83%^[9]。劳动资料向机械化、智能化演进,先进农机装备被广泛应用。劳动对象拓展至有机果蔬、特色养殖等多元领域。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关系提出了“规模化、协同化、市场化”的新要求。然而,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分散经营与新质生产力形成矛盾:单个小农户难以承担智能农机的购置成本,且技术应用能力薄弱;分散经营,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抗市场风险能力不足、农业生产收益偏低,且劳动力结构性短缺,“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难题。

为此,小岗村以农业社会化服务重构生产关系:通过土地托管整合细碎耕地,实现“小田变大田”;通过全产业链服务整合技术、市场等资源,让小农户共享规模收益;通过利益联结机制确保小农户在产业链中分享增值收益。这种调整以“服务规模化”弥补了“经营分散化”的短板,构建起新型生产关系。其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相适应,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三、小岗村农村改革的实践启示

(一)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激活改革内生动力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小岗村农村改革实践充分彰显了群众中蕴藏的改革智慧与创造伟力。农村改革中,尊重群众首创精神需把握三点:一是鼓励基层大胆探索、锐意创新。改革实践从来不是“一刀切”的模式复制,而

是多元探索的生动集合。“大包干”改革时期,凤阳县因地制宜探索出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组等多种形式生产责任制,小岗村更以“大包干”(包干到户)彻底突破旧体制;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半托管”与“全托管”等模式并行,也体现了基层根据实际需求灵活创新的智慧。这种允许试、鼓励闯的包容态度,是激发改革活力的前提。二是及时总结提炼,推动基层创新经验上升为国家政策法规。要善于从零散的基层实践中提炼共性经验,将局部探索上升为顶层设计,让“好做法”转化为“好政策”。三是让改革成果惠及群众,筑牢共享根基。“大包干”一举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让吃饱饭从奢望变为现实;农业社会化服务则通过多元利益联结机制,让群众分享发展红利,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所以,尊重群众意愿、鼓励基层探索,是确保改革举措精准对接现实需求的前提,能最大限度激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让群众共享改革成果,则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关键,能为农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二)坚持与时俱进,动态适配时代发展需求

从“大包干”解决温饱问题,到农业社会化服务助力农业现代化,每一次突破都紧扣时代课题,体现着“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不变的是对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规律的遵循,变的是具体改革举措。

农村改革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一是立足实践,发现问题。小岗村改革的起点,是“平均主义”导致的温饱问题;而当生产力发展后,小农户难以对接大市场、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等新难题又逐渐显现。唯有深入基层、贴近群众,才能从中精准识别问题。二是把握本质,分析问题。“大包干”的突破,在于把握了“积极性不高”的主要矛

盾;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探索,则是由于“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问题”。唯有抓住问题本质,改革才能找准发力点,避免盲目施策。三是积极创新,解决问题。针对经营体制的束缚,“大包干”以“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面对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矛盾,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统一服务+分散经营”模式,将小农户有效融入现代农业体系。所以,唯有坚持问题导向,秉持与时俱进的理念,在时代发展中调整生产关系,方能让生产关系始终与生产力发展同频共振、深度契合。

(三)强化制度保障,筑牢改革坚实根基

农村改革的深化离不开制度的巩固与完善。农业“大包干”先由基层探索,后提炼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规定并在全国推广,农业社会化服务从地方实践到写入中央文件、进入顶层设计,每一次改革都经历了“试点—总结—推广”的过程,其价值在于让改革成果可借鉴、可推广。农村改革中,强化制度保障需构建多层次支撑体系。一是标准体系层面,制定农业社会化服务质量规范,对农事操作规范、技术服务流程等设定明确技术标准,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二是激励机制层面,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优惠制度,对带动小农户成效显著的服务组织给予税收优惠或项目支持,激发其活力。三是监督体系层面,引入第三方评估,对服务质量、收益分配等进行全程监管,防止利益失衡与资源浪费。

(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改革行稳致远

党的领导是农村改革的根本保证。小岗村改革的每一步突破,都离不开党的领导。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安徽“省委六条”到“借地度荒”

政策,都为“大包干”提供了思想启蒙与政策空间;之后,从安徽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保护、支持到党中央不断根据实践发展作出政策回应,党始终是改革的领导者与推动者。可见,“大包干”是党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进入新时代,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党的领导:从中央一号文件持续聚焦农业社会化服务,到地方党委政府搭建服务平台、整合资源,党的领导贯穿全过程。农村改革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关键是守住“四个不能”底线: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在此基础上,还需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强化思想引领,通过政策宣讲、典型示范凝聚改革共识,让群众理解改革、支持改革。二是统筹资源力量,协调财政、科技、金融等部门形成改革合力。三是立足长远,科学谋划,既通过短期改革举措破解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痛点难点,又以长期战略布局为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

四、结论与展望

小岗村农村改革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立足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与条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实践。从“农业‘大包干’”到“农业社会化服务”,其核心逻辑始终是:立足时代背景,以问题为导向调整生产关系,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逻辑不仅适用于小岗村,更为全国农村改革提供了方法论启示:改革既要敢闯敢试,也要守正创新;既要聚焦当下、破解现实难题,也要与时俱进、着眼长远发展。展望未来,随着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农村改革将向更深层次突破:在服务形态上,数字化服务、绿色服务将成为主流,农业社会化服务将向“智慧化、生态化”升级;在经营模式上,“农户+服务主

体+市场”的利益联结机制将更紧密,形成“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共同体。只要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遵循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基本原理,就一定能破解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
- [2] 习近平.论“三农”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3] 王进,张逸轩.农业社会化服务对提升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的影响研究[J].农村金融研究,2024(12):41-53.
- [4] 冯长福,张军,卓文亮.小岗村连续8

年为村民分红[N].安徽日报.2025-01-27.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乔晓楠,马飞越,王奕.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J].江西社会科学,2025(6):54-65.
- [7]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
- [8] 杨蕾,李海阳.农业新质生产力:内涵、逻辑与路径[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83-94.
- [9] 统计新数据“三农”新画卷[N].人民日报.2025-01-03.

责任编辑:徐书琴

(上接第 17 页)明白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避免因暂时的困境而陷入自我怀疑的泥潭中,在接纳中保持自主发展的动力。

五、结语

青年悬浮期的“分”(类型差异)展现了社会分层与个体差异的客观现实,“合”(弱自主性)则揭示了转型期青年的共同困境。这一阶段既非“堕落的标志”,也非“短暂的偶然”,而是社会快速变迁中必然出现的“成长阵痛”。对青年而言,悬浮期不在于“尽快逃离”,而在于在悬浮中学会自主,在试错中明确方向,在迷茫中锚定价值,最终从“被动悬浮”走向“主动过渡”。对社会而言,更需以包容的心态接纳青年的“不完美成长”,通过结构支持与环境优化,使悬浮期成为青年“从青涩到成熟”的孵化器,而非绊脚石。

参考文献:

- [1] 韩炳哲.倦怠社会[M].王一力,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 [2]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社会[M].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 [3] 项飙,吴琦.把自己作为方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 [4] 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5]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 激励广大青年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N].人民日报,2019-04-21.

责任编辑:马俊

数智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价值意蕴、现实挑战和实践路径

何华生 晏志伟

(景德镇陶瓷大学,江西 景德镇 333403)

[摘要]数智技术通过变革教学范式、拓展时空维度、增强沉浸感与临场感,为思想政治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数智技术也带来了技术主导弱化教育主体话语权、信息茧房窄化教育客体认知视野、算法黑箱威胁意识形态安全等现实挑战。为此,应从增强技术主动、加强人机交互、强化价值引导、加强技术监管等方面入手,构建数智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以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智技术 思想政治教育 技术赋能

随着数智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正经历深刻变革。数智技术的应用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诸多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数智技术如何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分析其价值意蕴、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相应的实践路径,对于充分发挥数智技术的优势、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数智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价值意蕴

(一)变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 范式

数智技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理念、目标及方法产生深刻影响。

其一,教学理念从以教为主转向智能引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元宇宙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研究”(立项编号:SZZX22165)、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思政专项“数智技术赋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阶研究”(立项编号:2025ZX007)、景德镇陶瓷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提升研究”(立项编号:TDJG-24-Y51)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5-09-21

作者简介:何华生,景德镇陶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晏志伟,景德镇陶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导。与传统教学理念强调知识灌输不同,智能化引导式教学注重培养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AI 技术通过深度学习与数据分析,能够精准捕捉大学生学习需求与兴趣点,为教师提供有针对性的教学建议,激发大学生学习动力,促使他们主动探索、积极思考。借助智能机器和虚拟场景,可以更好地契合大学生的个性化需求,真正实现“因材施教”与“按需施教”。

其二,教学目标更注重大学生综合素养的培育。数智技术构建的智能化学习生态系统,为大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资源与实践机会,帮助他们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提升理论素养、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例如,通过数智技术平台开展虚拟实践活动,大学生可以在虚拟环境中模拟社会场景,提升实践能力,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其三,教学方法从讲授主导到多元协同。随着数智技术的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方法正从传统以教师单一讲授为主向多元智能融合转变。线上线下相结合、虚拟与现实相交融的智能化教学方式,正成为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新趋势。数智技术推动了教学方法的数智化转型,导学式、讨论式、体验式等教学方法因数智技术的引入而焕发出新的活力。同时,AI 驱动的互动式教学平台,如在线讨论、即时反馈系统等,为大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即时的学习指导,促进了师生、生生之间的深度交流与合作。

(二)拓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维度

数智技术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造了“全方位、全过程、全场域契机”^[4],使教育不再受限于传统的物理空间与时间框架,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时空形态。

其一,时间维度。思想政治教育不再局

限于固定的课时与学期框架,数智技术教育平台能够 24 小时不间断地提供服务,大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随时进入虚拟课堂进行学习、讨论与交流。此外,教师还可将历史事件、未来愿景等时间跨度较大的内容以虚拟场景的形式呈现,使大学生在“亲历”中深化对知识的理解。

其二,空间维度。数智技术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设虚实融合的教学场域。通过数字孪生、增强现实(AR)等技术,教师与大学生的现实影像被投射到虚拟空间,使他们能够在特定的背景、场景和语境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极大地拓展了教育的空间边界。数智技术中的教育空间具备高度的互动性与可定制性,教师可根据教学目标与内容灵活调整空间布局、元素设置等,以最优的方式呈现教育内容。这种从单一、传统的平面教育向多维、互动式的立体教育的转变,不仅提高了教育的广延性与包容性,还为教师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创意与想象空间。

(三)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沉浸感和临场感

数智技术的“场景应用”使教育过程变得生动、直观且感染力十足,在视觉、听觉、触觉等多个维度上刺激大学生的感官,显著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沉浸感与临场感。

其一,沉浸感。构建身临其境的学习体验。沉浸式教学通过数智技术构建高度逼真的虚拟场景,为大学生打造了身临其境的学习环境。AI 与 VR、AR 等技术的结合为沉浸式教学提供了有力支撑,驱动教学内容的可视化、教学场景的临场感、教学氛围的强交互以及教学过程的无边界,打造出立体化、具象化、直观化的视觉效果,使内容“立起来”“动起来”“活起来”,最大程度让大学生融入学习场景。通过虚拟场景与

全息课堂的映射,创设虚实结合的可视化教学场景,显著提升了思政课的教学效果。

其二,临场感。促进深度互动与情感共鸣。数智技术通过构建有强烈临场感的教学场域,让大学生以第一人称视角深入探索思政课内容。借助多模态分析、体感技术、适应性反馈及智能教学系统等技术,思政课教学场景不仅具备物理空间的真实沉浸感,还营造出多感官刺激的沉浸式交互场景,增强了场景的真实性与可信度。通过VR、AR等技术,大学生得以“亲临”历史事件与重大场景,在可见、可闻、可感、可触中与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面对面”,产生情感共鸣与思想共振。

二、数智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挑战

(一)技术主导弱化教育主体话语权

数智技术的运用使教师的主导作用面临被弱化的风险。

其一,信息环境的复杂性削弱教师引导力。数智技术打破了传统教育中师生双向互动的平衡生态,使主客体关系趋于不稳定。学生借助生成式AI可轻易获取海量知识,这直接动摇了教师的知识权威,削弱了学生的信任基础。同时,海量信息与多元观点虽拓宽了学生视野,却也使其陷入价值判断的困境,教师的聲音在信息洪流中极易被淹没,难以有效引导。当教育过程过度依赖技术而趋于模式化,缺乏必要的情感交流时,思想政治教育便失去了其应有的温度与深度,教师的引导力也因此被进一步削弱。

其二,技术门槛限制教师创新能力。数智技术的专业性与前沿性对高校思政课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虽庞大,但成员以人文社科背景为主,普遍缺乏网络运维与数智技术领域

的专业知识。由于技术水平不足,部分教师难以将数智技术与教育要素深度融合进行教学创新,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其三,虚拟化身挑战教师权威。尽管虚拟世界能够模拟教育过程,但它难以完整地重现现实教育场景中的复杂关系,教育意义的真正彰显仍需依托于现实世界的互动与实践。如果过于侧重虚拟体验而忽略了与现实教育的紧密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层内涵可能会被削弱。匿名性与多样性为大学生提供了表达个性与探索新知的广阔空间,但也对教师的传统权威构成了挑战。大学生在虚拟空间中追求个性化表达的过程中,可能会质疑教师的权威,导致教师对舆论场的掌控力减弱,话语权趋于分散,进而使教师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

(二)信息茧房窄化教育客体认知视野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拓宽大学生的认知视野是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然而,数智技术的兴起所伴随的信息茧房现象,对大学生认知视野的拓宽构成挑战。

其一,个性化推荐导致认知偏见。算法推荐通过内容匹配与协同过滤,向用户精准推送其可能感兴趣的信息。尽管这提升了信息获取的效率,却也使用户困于自我偏好构筑的“信息茧房”之中。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大学生在构建认知框架时,容易局限于自我认同的范畴,对异质观点或陌生议题形成选择性忽视。久而久之,其认知视野将趋于单一,难以形成全面、客观的认知体系。这不仅限制其认知能力的发展,也可能削弱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接受意愿与内在认同。

其二,信息孤岛加剧认知局限。数智技术塑造的信息茧房,使大学生易于陷入信息孤岛,导致其综合分析能力受限,难以深入且多角度地思考复杂问题。长此以往,不

仅阻碍其跨文化理解与批判性思维的形成,也会削弱其在现实社会中对复杂情境的综合判断力,甚至引发认知上的混淆,严重影响其认知体系的健全发展。

其三,虚拟社交圈层固化认知框架。数智技术虚拟社交为大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社交方式,但社交圈层固化现象日益凸显。大学生在虚拟空间中基于共同兴趣形成同质化圈层,限制了对多元观点、信息的接触,加剧了认知局限与偏见。“智能供给模式精准高效的计算法则实质上窄化了受教育者对多元化信息的接受空间。同质信息的持续循环接收,使受教育者日益固化其自身的价值偏见,沉侵于舒适性的价值圈层。”^[2]个体留恋圈层而抗拒“出圈”,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减弱,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共识被稀释。

(三)算法黑箱威胁高校意识形态安全

在数智技术背景下,信息的产生和传播呈现出“去中心化”特征。由于虚拟空间缺乏及时有效的监管,算法黑箱现象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深层次威胁,“预设于算法规则中的价值观念很大程度上会随着智能推荐的迭代升级而被放大、强化,成为引发意识形态风险的关键因素”^[3]。

其一,扭曲社会认知。AI技术通过预设的算法规则和价值判断,对用户实施特定的“信息投喂”,往往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信息被边缘化。算法偏见不仅限制大学生对多元文化的理解与接纳,还可能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更值得警惕的是,算法黑箱导致信息环境复杂,大大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例如,当算法倾向于大量推送负面或误导性内容时,容易扭曲大学生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使其对主流观念产生怀疑甚至抵触。在算法逻辑的隐蔽操控下,经过

筛选和定向推送的信息不断形塑大学生的认知结构,导致其对现实的理解偏离真实,引发系统性认知偏差。这一过程不仅解构个体已有的价值体系,还影响其对各类社会现象的正确判断,最终加剧意识形态领域的整体风险与挑战。

其二,冲击价值信仰。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常通过各种渠道以隐蔽方式进行文化输出和价值观渗透,影响高校师生的思想观念和 value 取向。由于算法黑箱的不透明性,算法内在偏见和意识形态渗透可能影响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而影响其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设计者可以利用‘算法黑箱’设计出带有信息推荐偏见的算法,以传播和散布符合自身或特定群体利益的信息”^[4]。这些经过精心包装的内容,往往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迷惑性,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形成张力,导致部分学生不同价值体系的碰撞中产生认同困惑,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与主流价值认同构成深层威胁。

三、数智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增强技术主动,提升教育主客体智能素养

在数智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智能素养显得尤为重要。

其一,提升教育主体的智能素养。教师需筑牢坚实的技术理论基础,深入理解数智技术的核心概念、运行机制及其潜在影响,从而更有效地将其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为此,教师需以开放的心态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体系,持续提升自身在数智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方面的能力。教师可以通过积极参与数智技术相关的研讨会、工作坊及在线课程,掌握最新的技术应

用动态。高校也应通过加强教师培训,提升教师的技术素养与教育专业能力。具体而言,高校可以举办专题培训班、教师交流论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全面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培训内容应涵盖数智技术基础、教学应用、伦理规范等多个维度,以确保教师能够全面掌握数智技术的相关知识,并能够在实践中灵活运用。

其二,提升教育客体的智能素养。大学生需树立正确的科技观和伦理观,以理性、科学且全面的视角审视数智技术等新技术。因此,大学生应强化自主学习与信息甄别能力,全面提高自身的数字素养。高校应通过课堂教学、网络培训等多种途径,系统地为学生提供数字知识、技能和伦理规范的学习机会,同时,高校应将科技伦理教育融入专业课程体系,通过组织专题讲座、案例分享等活动,提升大学生的科技伦理意识和技术应用自律意识。

(二)加强人机交互,推动虚实融合融通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数智技术的耦合关系必须建立在虚实融合的基础之上,将现实场域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嵌入数智技术的虚拟场域,使数智技术成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重要工具和载体。

其一,推动虚拟教学场景与现实的融合,提升教育互动性。将虚拟教学场景与实体课堂及实践活动深度融合,使大学生既能享受虚拟环境提供的个性化学习体验,又能通过现实世界中的面对面互动来提升社会适应能力。在虚拟教学场景中,应融入更多真实世界的案例与数据,让大学生在模拟环境中感知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设计贴近现实挑战的虚拟任务,模拟现实世界可能遭遇的难题,以此锻炼大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进而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

其二,厚植教育情感,弥补技术情感缺失。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防止教育中人的主体性被弱化。要将生成式数智技术与MR(混合现实)、XR(扩展现实)等前沿感知技术相结合,丰富教育场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推送、沉浸式互动和无感化渗透。同时,为弥补情感交流的不足,应引导和支持人机交互中的情感互动,提升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数智技术构建的情境中的理解与表达能力,进而增强双方的情感共鸣。

其三,打破虚拟社交圈层,促进跨圈层交流与融合。首先,构建跨圈层社交平台,鼓励大学生参与不同兴趣圈层的交流。通过设计灵活的社交功能,如跨圈层搜索、推荐与匹配等,帮助大学生拓宽其社交视野。其次,在虚拟社交中融入社会责任感教育,增强大学生的社会参与意识与归属感。最后,通过开展线上公益活动与跨圈层合作项目,鼓励大学生跨越圈层界限,共同为社会贡献力量,提升其社会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三)强化价值引导,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

为确保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必须从多维度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构建多元化、立体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矩阵。

其一,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确保教育的正确方向。新时代的思想教育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目标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始终。高校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旗帜鲜明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坚守铸魂育

人的价值立场。为应对数智技术带来的复杂信息环境,高校需对数智技术平台中的信息进行严格把关,确保所传播的内容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对于错误价值观和虚假信息,应积极主动回应,及时驳斥,从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其二,构建多元化、立体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矩阵。通过构建主流媒体新媒体传播矩阵,发挥技术、内容、终端的协同作用,牢牢掌握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意识形态主导权^[9]。高校需充分利用数智技术平台的独特优势,创新传播渠道和方式,以更广泛、更深入地触达高校师生。一方面,利用数智技术平台创建虚拟课堂、在线讲座、互动论坛等,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范围。另一方面,邀请具有深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思政教师参与内容创作与传播。通过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开展直播等方式,向高校师生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和思想观念,提升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接受度。

(四)加强技术监管,规范算法应用

为确保数智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健康、安全应用,必须完善技术监管体系,建立算法应用保障机制。

其一,加强技术监管,优化算法推荐机制。在数智技术环境中,算法推荐机制的公正性、合理性和透明度是确保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关键。为此,必须强化监管,建立严格的算法审查机制,确保推荐逻辑公正、合理且可追溯,消除潜在的偏见与歧视。同时,提升算法透明度,让用户能够了解推荐逻辑,增强对推荐结果的信任。在此基础上,对算法内嵌程序进行深度优化,将主流意识形态置于算法推荐的优先级。

其二,建立保障机制,规范算法应用。政

府应制定相关政策法规,规范数智技术的应用,并制定教育领域应用数智技术的伦理标准体系和教育治理框架。“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基于当前法律法规和自身特性制定应用人工智能的规范。”^[10]高校应提升校园数智技术、智能设备及衍生服务的算法透明度,对使用数智技术算法技术进行全面规划和管理。同时,确保智能算法的安全性和可控性,避免出现数据泄露、信息茧房和算法黑箱等问题。通过这些措施,有效降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意识形态风险、数据风险和伦理风险,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

参考文献:

- [1] 王霖凡.数字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转向:样态、风险及其优化[J].思想教育研究,2024(4):39-46.
- [2] 方正.数智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化:出场、风险与实践策略[J].思想理论教育,2024(10):85-91.
- [3] 苏玉波,李浩.智能推荐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防范[J].思想理论教育,2025(1):89-94.
- [4] 华敏,魏浩天.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三维探赜[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4(6):149-156.
- [5] 金程远,韦卓翔.算法推荐视域下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的机制、挑战及其对策[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5(20):1.
- [6] 常宴会.思想政治教育应用人工智能的实现条件[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5(2):124-130.

责任编辑:徐书琴

作风何以关乎党性？

——列宁关于执政党作风问题的重要阐释

魏志达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 350117)

[摘要]在列宁看来,党性是内在灵魂,作风是外在彰显;党性决定作风,作风反映党性。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清醒地认识到,执政后的党面临着蜕化的巨大危险。基于此,列宁反复强调作风问题是党性不纯的外在表现形式、作风问题必将导致党性的弱化与缺失,因而加强作风建设是党性内化践行的关键途径。因此,通过深入研究列宁关于执政党作风问题的重要阐释,既能深入领会“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这一重要论断的深刻内涵,亦能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指明路径,加强党性修养并非空洞口号,必须落实落细到日常的作风之中,而这一切都是检验党性纯度的“试金石”。

[关键词]列宁 作风建设 党性 党的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加强作风建设,坚决纠正‘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1],而“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2][10]}。作风是思想行为的外在表现,党性是内在政治品格,优良的作风有助于巩固党性根基,保持良好作风对维护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具有积极作用。十月革命后,作为第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列宁清醒地认识到,作风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方式或工作方法问题,而是党的宗旨、

性质和政治路线的直接体现与外在行为表现,因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需要建设什么样的党风、怎样建设党风构成了这一时代课题的核心内容之一”^[3]。在推进俄共(布)建设的进程中,列宁并没有抽象地谈论党性,而是将其具体化为党的实际活动和党员的实际行为。他认为,一个政党的性质不是自封的,必须在实践中、在与群众的联系中得以证明。因而,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内容,就成为人民群众

基金项目:2024 年度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文化建设研究”(立项编号:FJ2024XZB063)。

收稿日期:2025-09-22

作者简介:魏志达,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直接感知和判断这个党“是什么性质”“代表谁的利益”的最直观标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将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其核心之一就是持之以恒地加强作风建设。因此,对列宁关于执政党作风问题的研究,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史的层面,特别是列宁主义的高度,为“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这一重要论断提供深厚的理论依据,进而更有力地说明反对“四风”绝非权宜之计,而是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本质要求。

一、作风问题是党性不纯的外在表现形式

在列宁看来,作风是党性的外在具象化呈现,执政党作风层面的偏差与问题,并非孤立行为,而是直接暴露其党性修养不纯。

(一) 作风问题体现为党员将个人利益置于党的事业之上

党性的核心要义在于党员始终以党的组织原则为遵循、以党的事业发展为根本,而将个人利益置于党的事业之上的作风问题,本质是党性不纯在行为维度的显现,其重要特征是用个人地位诉求取代党的事业目标,使党的规则与组织程序沦为服务个人利益的工具。列宁明确将官僚主义界定为“使事业的利益服从于向上爬的需要,就是一味追求地位而忽视工作,为增补进行争吵而不进行思想斗争”^{[4]363},这一界定精准揭示了作风问题与党性不纯的内在关联。党性要求党员对党的决议绝对服从、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而部分党员“未经代表大会任命的人极力设法在党的一个中央机关取得位置”^{[4]411},甚至为维持“家庭式小团体的‘继承性’”^{[4]411}而抵制党的正式决议,这一行为完全背离了党性的核心要求。同时,列宁尖锐指出,部分党员在“正式决议对你们不利的时候,你们就不服从,而与此同

时,当同盟的正式权利对你们有利的时候,你们就毫不客气地加以利用”^{[4]411},通过选择性适用党的规则,将个人地位争夺置于党的组织原则之上,其作风层面的投机性,恰恰暴露了党性中组织观念缺失、事业意识淡薄的根本缺陷,使党的事业沦为个人向上爬的垫脚石。

将个人地位置于党的事业之上的作风,通过以破坏组织的手段谋取地位的极端行为,进一步撕裂了党性所要求的党的团结统一,凸显党性不纯的严重性。列宁尖锐指出,部分党员为争夺位置“不惜采取抵制和瓦解组织的手段”^{[4]411},他们将按照党代表大会意志承担党的工作的同志污蔑为官僚,实则是“对中央机关人选不满的一种掩饰”^{[4]362},是“掩盖他们违背自己在代表大会上郑重说过的诺言的一块遮羞布”^{[4]362}。当他们“拒绝在他们所仇视的中央机关领导下工作”^{[4]363},甚至“用破坏来代替说服”^{[4]363}时,已然突破了党性的底线。党性要求党员以党的团结为生命,以说服教育为解决分歧的根本方式,而此类党员为实现个人地位诉求,不惜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党的生存与发展之上。更值得警惕的是,他们将个人对地位的欲望包装成反对官僚主义、抵制压制个人首创性,却回避对中央机关工作的实质批评,正如列宁所言,“这些关于官僚主义的叫喊中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什么实在的内容”^{[4]362},其真实目的是通过否定党的组织安排,为个人争夺地位制造舆论假象。这一“为增补进行争吵而不进行思想斗争”^{[4]363}的作风,彻底暴露了其党性中原则性缺失、对党的事业缺乏信心的本质,使党的组织体系成为个人地位博弈的战场,严重损害党的事业根基。

此外,维护小团体继承性的作风偏好,是将个人地位置于党的事业之上的延伸表

现,进一步印证了党性不纯的深层根源。部分党员极力坚持“家庭式小团体的‘继承性’”^{[4]11},其本质在于通过维护小团体的既得地位,实现个人位置的稳固与延续。列宁指出,这些人“对代表大会直接斥责他们的小组习气愈是感到不愉快,就愈是竭力坚持他们的小组习气的‘继承性’”^{[4]362},其作风层面的小团体主义,实则是党性中全局意识缺失、本位主义严重的体现。党性要求党员立足党的整体事业思考问题,而小团体主义者将小团体的利益置于党的全局事业之上,通过排斥外部成员、垄断机关位置,使党的机关沦为小团体的“私人领地”。这一作风不仅阻碍党的新鲜血液进入,导致机关活力衰退,更使党的事业偏离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向,沦为小团体谋取私利的工具,其党性不纯的危害,已从个人层面扩散至党的组织与事业层面,成为侵蚀党的执政根基的潜在风险。

(二) 作风问题暴露了党员纪律涣散与原则缺失

党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对违纪行为的纵容性处置,是作风层面纪律涣散的典型表现,而这一涣散本质上是党性不纯在纪律遵守方面的直接暴露。党的纪律作为维护党的纯洁性、保障党的事业发展的刚性约束,要求党员对损害党的形象与利益的行为保持零容忍态度,尤其对贪污受贿等直接侵蚀党的执政根基的行为,必须依规严惩。“列宁晚年通过不断丰富党的纪律内容,为严明俄共(布)的政治纪律提供了根本保证”^[5]。列宁针对1918年5月2日审判贪污案件指出,党员法官“对案情属实、本人供认不讳的受贿者只判了半年监禁”^{[6]263},并直言“不枪毙这样的受贿者,而判以轻得令人发笑的刑罚,这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是可耻的行为”^{[6]263}。这一轻判行为绝非

简单的量刑失当,而是纪律涣散的集中体现,即党员法官作为党的纪律与国家法律的执行者,本应成为纪律的坚定捍卫者,却对明确的违纪行为予以纵容,使党的纪律沦为可随意变通的柔性规则,而非不可逾越的刚性底线。纪律涣散意味着党员对党的纪律要求的漠视,而党性的核心要义之一便是严守党的纪律,这种漠视将直接导致党性中纪律意识的缺失,使党性不纯从隐性状态转化为显性的作风问题。

作风层面的纪律涣散往往与原则缺失相伴而生,二者相互交织,共同构成党性不纯的深层表征。反贪污受贿是党维护政治根基、践行初心使命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不仅是法律层面的要求,更是党性立场的集中体现。党始终将反对腐败、保持廉洁作为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任何对贪污行为的妥协,都是对党的原则的背离。列宁强调指出:“只要有贪污受贿这种现象,只要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谈不上政治”^{[7]210-211},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反贪原则与党的政治生命的内在关联。放弃反贪原则,“甚至连搞政治的门径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搞政治,因为一切措施都会落空,不会产生任何结果”^{[7]211},党的公信力也将随之崩塌。党员法官对受贿者的轻判,实质是在反贪污问题上放弃了党的根本原则,他们未将维护党的纯洁性、捍卫党的政治基础作为审判的根本遵循,而是以个人裁量取代原则要求,使得党的根本原则沦为形式化的存在。原则缺失表明党员偏离了党性所要求的坚守政治立场、维护党的整体利益的根本方向,其背后是党性中政治原则的动摇,而作风层面的轻判行为,正是这一原则缺失的直接外化,进一步印证了党性不纯的本质。

纪律涣散与原则缺失的作风问题,最终

会导致党员背离革命共产党人的党性本色,沦为党的事业的损害者,其危害远超个体行为失范的范畴。列宁明确指出,此类对贪污者轻判的党员“应该是与克伦斯基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为伍,而不能跻身于革命的共产党人之列”^{[6]263},这一判断精准界定了作风问题与党性归属的关系,即共产党人的党性要求以铁的纪律和坚定原则捍卫党的事业,而纪律涣散者对纪律的漠视、原则缺失者对原则的放弃,使其彻底脱离了共产党人的党性轨道。当党员法官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党的纪律与原则之上时,他们便从党的纪律执行者、原则坚守者异化为纪律破坏者、原则妥协者,其作风问题不再是孤立的履职失误,而是党性不纯的终极暴露。正如列宁所言:“在容许贪污受贿和此风盛行的条件下,实施法律只会产生更坏的结果”^{[7]211},这一作风问题若蔓延,将导致党的纪律体系崩塌、原则立场模糊,最终动摇党的执政基础,而其根源始终在于纪律涣散与原则缺失所暴露的党性不纯。

(三) 作风问题反映了党员思想动摇与信仰不坚定

“党的作风出现问题,很多时候是因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出了问题”^[8],党员空谈高调、脱离实际的作风,本质是思想层面背离党的实事求是原则的外在显现,而思想动摇的深层根源则是对党的信仰体系的怀疑,最终暴露党性不纯的本质。列宁尖锐批判莱维及孟什维克“把‘工人阶级的力量’这个概念变成偶像,不善于考虑它实际的具体内容”^{[7]120},且“不是研究和分析这些内容,而是一味唱高调”^{[7]120},这一空谈作风绝非简单的认知偏差,而是思想动摇的直接反映。党的信仰要求以工人阶级的实践力量为根基,从具体实际出发制定策略,而此类党员却将工人阶级的力量抽象为口

号,忽视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现在管理着俄国,建立了军队,领导着这支军队,建立了地方管理机关,管理着工业”^{[7]120}的实际成就。思想动摇使其无法立足实践把握工人阶级力量的具体内涵,信仰不坚使其丧失对工人阶级是党的根本依靠的坚定认同,在二者共同作用下,作风沦为脱离实际的高调空谈,而非践行信仰的实际行动,党性中以实践为根基、以工人阶级力量为依托的核心要求被彻底架空,党性不纯由此显现。

党员因纠治弊病而否定制度本质的作风,进一步印证思想动摇已演变为对党的制度与事业的认知错位,其根源在于信仰不坚导致对党的历史使命缺乏根本认同,加剧党性不纯的危害。列宁明确指出,部分党员“由于同新制度下的弊病作斗争而忘记了新制度的内容,忘记了工人阶级建立了并领导着苏维埃类型的国家”^{[7]120},这一抓弊病而弃本质的作风,背后是思想层面的片面化认知。思想动摇使其无法辩证看待新制度优越性与发展中弊病的关系,陷入因瑕废玉的认知误区;而信仰不坚则使其丧失对党的制度是工人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的坚定信念,无法从历史必然性视角认同苏维埃制度的先进性。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要求党员既要敢于直面弊病,更要坚守制度自信,而此类作风既背离了辩证看待问题的思想方法,又放弃了对党的制度的信仰和坚守,使党性中捍卫党的事业、认同制度本质的底线被突破,党性不纯从思想偏差上升为对党的事业根本的背离。

此外,党员在紧要关头立场摇摆、妥协退缩的作风,是思想动摇到立场坍塌的极端表现,其本质是信仰不坚导致对党的革命使命的彻底放弃,凸显党性不纯的严重后果。列宁评价第二国际“很想自称为革

命家,实际上一到紧要关头就变成反革命分子,因为他们怕用暴力破坏旧的国家机构,他们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7]120},这一临阵变节的作风,是思想动摇积累后的总爆发。思想层面长期怀疑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导致在破坏旧机构、巩固新制度的关键节点丧失行动勇气;而信仰不坚则使其彻底放弃党领导工人阶级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革命使命,沦为旧势力的妥协者。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要求党员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守革命立场,以信仰支撑行动,而此类作风既丧失了思想上的革命坚定性,又放弃了信仰上的使命担当,使党性中革命立场不可动摇、党的使命必须践行的核心特质荡然无存,党性不纯的危害从个体行为扩散至对党的革命事业的损害。

二、作风问题必将导致党性的弱化与缺失

列宁视纪律为无产阶级执政党存续之基,而作风问题的滋生蔓延,会逐步瓦解纪律防线、侵蚀党性内核。

(一)作风问题削弱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在列宁看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核心支撑,在于党与作为“全部政权所依靠的源泉”^{[9]252}的工会形成协同共生关系,而作风问题恰恰是割裂这一关系、瓦解领导组织依托的关键诱因,其本质是对党性中依靠群众组织、巩固阶级联盟要求的背离。列宁深刻指出:“假如党与工会发生分裂,党是有过错的,其结果一定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9]251},此处的“党有过错”,在实践中多体现为党在与工会互动中的作风偏差,如官僚主义的决策方式、漠视工会诉求的工作态度、脱离无产者实际需求的政策倾向等。此类作风问题会使工会从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组织异化为与党疏离的力量,而工会

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使它成为经济联合者,它通过自己的工业把千百万分散的农民联合在一起”^{[9]252}的关键纽带,一旦与党分裂,党便失去了将无产者与农民整合为统一政治力量的组织载体。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需要依托工会实现对基层工农群众的动员与凝聚,作风问题导致的党与工会分裂,会直接切断党与基层的联系通道,使集中统一领导因缺乏组织支撑而陷入指令难下、力量难聚的困境,党性中维护组织团结、巩固政权基础的核心要求被彻底突破。

作风问题还会通过侵蚀无产者对党的政治认同,削弱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阶级基础,这是对党性中坚守阶级立场、依靠无产者原则的根本背离。列宁强调指出:“除了千百万无产者,我们没有别的支柱”^{[9]251},且无产者“20年来一直认为,这个党是他们自己的”^{[9]251},这一认同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得以实现的思想根基,即无产者对党的信任,使其愿意服从党的统一指挥、贯彻党的决策部署。若党存在脱离无产者的作风问题,如忽视无产者的实际困难、推行脱离其认知水平的政策、以官僚化方式对待其诉求,便会打破无产者“党是自己的”这一核心认知,导致其对党的认同从主动追随转向被动应付,甚至怀疑抵触。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并非单纯依靠组织强制,更依赖于无产者基于认同的自觉服从,当作风问题瓦解这一认同,集中统一领导便会失去千百万无产者的阶级支撑,沦为缺乏工农群众基础的“空壳指挥”。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如果我们本身不犯错误,谁也摧毁不了我们”^{[9]252},作风问题正是这种“自身错误”的集中体现,它通过消解无产者的政治认同,从根本上削弱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阶级基础,使党性中以无产者为支柱、以工农群众认同为基础的领导逻辑难以落地。

此外,作风问题引发的党与群众组织、无产者的疏离,还会进一步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所需的政策执行力,使党性中令行禁止、上下贯通的要求沦为形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需通过工会、无产者等中间力量传递政策、凝聚力量,若党因作风问题与工会分裂、与无产者疏离,这一链条便会出现断裂。党制定的政策难以通过工会传递到基层无产者,无产者的实践反馈也无法有效传导至党的决策层,导致政策要么悬空不落地,要么落地走样。列宁指出:“一个无产者要比200个农民更有力量”^{[9]252},无产者的组织性与行动力是政策执行的核心动能,而作风问题使党无法有效激活这一动能,集中统一领导便会因执行梗阻而丧失实际效能。作风问题导致的“领导失灵”,本质是党性被侵蚀的结果,党性要求党通过优良作风维系与群众组织、无产者的紧密联系,确保领导链条的完整与高效,而作风问题打破了这一联系,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从实质有效退化为形式存在,最终危及苏维埃政权的存续根基。

(二) 作风问题导致了党的制度虚设与执行失效

作风层面的泛泛而谈与空话连篇,是直接导致党的制度内容空洞化进而陷入虚设境地的重要诱因,其本质是对党性中制度需要立足实践、服务实际根本要求的背离。列宁尖锐批判《俄共目前农村政策的基本原则》“第3节全节多为泛泛之谈”^{[10]43}“这样单纯地重复是有害的;这会使人讨厌、乏味,对唠唠叨叨的话产生反感”^{[10]43},并直指此类作风催生“当今的‘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10]44}。党的制度本应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动准则,需以具体案例、确切事实为支撑,如列宁所倡导的“哪怕拿一个县作例子,用实际的分析说明应该怎样帮助‘合作

化’,而不是用愚蠢的共产主义的合作社游戏去激怒农民”^{[10]43},但泛泛而谈的作风使制度脱离实践土壤,仅停留于“大家听厌了的愿望”^{[10]44},既无明确实施路径,也无具体责任主体,沦为学院式的空洞文本。制度的制定必须具备可操作性与针对性,而此类作风使制度丧失解决实际问题的核心功能,从行动指南异化为形式摆设,制度虚设的根源便在于此,即作风背离了党性要求的实践导向,使制度失去落地的现实基础。

同时,作风层面存在机械套用法令条文与指令的倾向,进一步加剧党的制度执行失效,其本质是对党性要求的制度执行需要实事求是、贴合基层原则的背离。列宁明确指出:“官僚主义所以在危害我们,正是因为我们还在玩弄‘法令形式的指令’”^{[10]43},并断言“作者未必能再想出什么比这更坏更有害的东西了”^{[10]43}。党的制度执行需依托基层实际情况灵活落地,如帮助农民改进农艺、推进合作化,均需要结合不同地区的生产条件、农民认知水平制定具体措施。但是,“法令形式的指令”作风将制度简化为冰冷的条文,不考虑贫苦农民的现实需求,仅以指令形式强制推行。这一脱离基层的执行方式,要么导致基层因缺乏实施条件而被动应付,要么因指令与实际脱节而引发农民反感,最终使制度执行陷入空转,看似有指令下达,实则无实效产生。党性要求制度执行需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法令形式的指令”作风恰恰是制度落地实施的“拦路虎”,致使执行链条断裂,制度沦为纸上规定,执行失效由此成为必然。

作风问题造成的制度虚设与执行失效,本质是对党性保障制度运行作用的全面侵蚀。列宁强调指出:“对这个题目不能这样处理。这样处理是有害的”^{[10]43},其有害性不仅在于制度本身的失效,更在于作风问题

会瓦解党性对制度运行的保障作用。一方面,“泛泛而谈”使制度制定环节脱离党性的实践导向,丧失精准性;另一方面,“法令形式的指令”使制度执行环节背离党性的群众导向,丧失可行性。更严重的是,此类作风会滋生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惰性,使其不愿“拿出实际经验的材料,即使是一个县一个乡的也好”^{[10]44},不愿深入基层核查制度落实情况,导致制度执行缺乏监督与校准,虚设的制度无人修正,失效的执行无人问责。党性本应是制度从制定到执行的保障线,而作风问题通过侵蚀这一保障线,使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均偏离正轨,最终造成制度虚设与执行失效的双重困境,这正是作风问题对党性产生严重侵蚀的集中体现。

(三) 作风问题破坏了党与群众的法定联系渠道

“列宁党性观要求共产党员‘联系群众,生活在群众之中’”^[11],列宁所主张的张贴接待来访时间告示、设立可自由出入的接待室、来访登记簿、星期日接待的问事处等制度化安排,其核心功能在于保障工农群众诉求能通过法定路径传递至苏维埃机关,而作风问题恰恰通过使这些法定渠道形式化,直接侵蚀党性中密切联系群众的根本要求。部分党员干部若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如不按规定张贴接待信息、将接待室设置在需要出入证的封闭区域、对登记簿敷衍记录甚至不记录,便会使法定的工农群众来访渠道从可及化平台异化为象征性摆设。列宁明确要求接待室“必须设在可以自由出入、根本不需要什么出入证的地方”^{[12]360},且问事处需“替不识字的人和写不清楚的人免费代写申诉”^{[12]361},这是基于工农群众实际需求对法定渠道的人性化设计;而作风偏差导致的渠道形式化,既违背了法定

渠道的制度初衷,也背离了党性、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立场。工农群众因渠道不通无法表达诉求,党因信息阻断难以感知群众关切,法定联系渠道的桥梁作用被作风问题切断。

同时,作风问题还通过堵塞工农群众控告与监督的法定渠道,进一步破坏党与群众的联系,其本质是对保障群众法定监督权利要求的背离。列宁以“南方造纸管理局”为例,指出工农群众“说不出把对‘南方造纸管理局’的控诉书送到哪个机关去了”^{[13]321},而部分党员干部虽知晓官僚主义弊病,却“不会认真地把事情抓下去”^{[13]321},既不将工农群众控诉书送达人民委员会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等法定接收机关,也不“把那些办事拖拉的人送交法院”^{[13]321-322},甚至以程序繁琐、易得罪人等为由回避履职。正如列宁所言:“工人或农民为了一件事,不得不到一个机关去四五趟,最后得到一个在手续上无懈可击、实际上却是一种嘲弄的答复”^{[13]322}。作风问题导致的控告渠道堵塞,使工农群众的法定监督权利无法落地。党性要求党员必须成为群众法定权利的维护者,而作风层面的敷衍塞责、回避斗争,不仅使群众对法定渠道丧失信任,更让党失去了通过群众监督发现并纠正自身问题的机会,法定联系渠道的监督功能被作风问题消解,党与群众的信任纽带随之弱化。

此外,编造传播政治谣言的行为,会进一步消解法定联系渠道的公信力,甚至为敌对势力提供可乘之机,这是对党性中维护法定渠道严肃性与权威性要求的严重背离。列宁警示,部分党员“到处发牢骚或者传播某某机关干了某某坏事这一类笑话”^{[13]321},而这些笑话“往往过几天就会在孟什维克的杂志上全部登出来”^{[13]322},沦为敌

对势力攻击苏维埃政权的工具。法定联系渠道的公信力建立在工农群众诉求能通过该渠道得到解决的实践基础上,而党员不通过法定渠道解决问题,反而以空谈和“笑话”宣泄不满,既无法实质性改善工作作风,又会向工农群众传递“法定渠道无用”的信号,导致工农群众对党的法定联系渠道从信任转向怀疑。党性要求党员必须以实际行动捍卫法定渠道的权威性,通过揭发坏人坏事、公正审理案件等实际成果巩固群众信任;而作风问题中的空谈与传播“笑话”,既背离了党性的实践要求,又破坏了法定渠道的公信力根基,使党与群众的法定联系渠道在群众心中逐步失效,最终侵蚀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三、作风建设是党性内化践行的关键途径

在列宁的认知中,党性的落地并非抽象概念,需依托具体作风实现转化。作风建设正是将党性原则从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转化的重要维度,是确保党性要求真正融入执政行为的关键。

(一) 以反对官僚主义斗争锤炼党性的坚定性

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本质上是对党员党性背离倾向的清除与纠偏,通过直面党内身居苏维埃要职却为拖拉现象掩护的官僚主义者,即列宁所称的“内部最可恶的敌人”^{[10]14},促使党员正视自身或身边党性的弱化病灶,为党性的坚定性奠定基础。党性坚定性的核心要义在于始终坚守党的宗旨与组织原则,而官僚主义正是党性的直接对立面,它使党员从人民公仆异化为脱离群众的官老爷,从责任担当者退化为拖拉作风的掩护者。列宁指出:“必须清除这种敌人,我们要借助所有觉悟的工人农民收拾这种敌人”^{[10]14},这一斗争要求党员突破因勤

勤恳而受尊敬的表象,主动站在工农立场上批判官僚主义。这一站在工农群众一边反对内部弊病的选择,正是党性中群众立场的实践强化;而敢于揭露身边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拒绝为之掩护,则是对党性中忠于党的事业而非个人情面原则的坚守,斗争过程由此成为党员明晰党性边界、清除背离倾向的自我净化过程,党性的坚定性在破立之间得以初步锤炼。

以制度规范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则通过将党性要求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规范与责任要求,使党员在落实制度、对抗惰性中锤炼党性的坚定性。在关于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上,列宁明确要求“同哥尔布诺夫一起拟定一个关于提出和处理问题的书面条例,并且每月至少检查一次”^{[7]399},核心目标是减少文牍主义和拖拉作风、强化人民委员们的责任心、建立个人负责制,这些制度设计直指官僚主义的核心病灶,即“上层机关即各人民委员部及其各部门实际上都存在着根本无人负责的现象”^{[7]400}与“危害事业的奥勃洛摩夫习气”^{[7]400}。党性的坚定性并非抽象的政治表态,而是体现在对党的制度的坚决执行与对责任的主动承担中。党员在每月检查条例执行情况时,需直面“是否不再乱发匆匆炮制的指示”^{[7]399-400}“文牍主义和拖拉作风是否有所减少”^{[7]399}等具体问题,这要求其克服敷衍塞责的官僚惰性,将党性中的务实原则转化为慎重地、长期坚持地工作行动;而建立个人负责制,则迫使党员从无人负责的涣散状态中走出,以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承接工作,避免怠工分子钻空子。这一制度要求与责任强化的斗争路径,使党性的坚定性从理论认知转化为行动自觉,在解决具体官僚主义问题中得到实质性锤炼。

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艰巨性,通过长期对抗、拒绝松懈的实践磨砺党员党性的韧性品格,使党性的坚定性突破一时坚守的局限,实现持久巩固。列宁清醒认知斗争的难度,指出,“我知道这非常难办。但是正因为难办,您就应该全力以赴”^{[7]400},并警示“如果不注意、不督促、不检查、不拿三根鞭子抽打”^{[7]399},在“奥勃洛摩夫式的风气下,两个星期就会‘松下来’”^{[7]399}。这一艰巨性恰恰是锤炼党性韧性的关键,官僚主义并非一次性可清除的显性错误,而是根植于工作惰性的隐性倾向,需要党员长期保持警惕、持续纠治。例如,办公厅主任需“养成(像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秘书处一样)严格把关的习惯,不让那些琐碎问题提到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来”^{[7]399},通过“三次过滤”^{[7]399}的流程抵御图省事、降标准的惰性诱惑;党员在长期检查条例执行中,需反复克服松劲心态,确保文牍主义不反弹、责任心不弱化。这一与自身惰性对抗、与不良风气较量的过程,使党员的党性的坚定性不再依赖外部约束,而是内化为拒绝松懈、坚守原则的韧性品格,真正实现历经考验而不褪色的坚定。

(二) 以密切联系群众实践增强党性的人民性

党性的人民性的核心要义在于始终将人民利益作为根本遵循,而脱离群众的作风正是党性的人民性弱化的直接诱因。列宁明确要求地方同志“千方百计地密切同非党人员的联系和从他们中推荐新的工作人员”^{[13]246}“更加接近群众”^{[13]246}“加强同非党人员的切实联系”^{[13]246},同时强调公职人员需“更加注意在我们贫困的状况下还能解决的生活必需品缺乏的问题”^{[13]246}。这些实践要求直指脱离工农群众的作风病灶,党员若陷入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下服务的官僚

状态,便会忽视工农群众对生活必需品的基本需求,背离从群众中选拔人才的组织原则;而通过主动联系非党人员、解决民生痛点,党员作风从脱离群众转向贴近群众,党性的人民性也随之从抽象原则转化为具体行动。群众在获得实际利益、参与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切实感知党的人民立场,党员则在服务群众的实践中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党性认知,二者形成了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良性循环,党性的人民性的根基由此夯实。

“要使工农大众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必须是他们具有参与的能力——或者,国家的管理工作简单到每个识字的人都有能力参与;或者,国家管理工作依然很复杂,甚至比以往更复杂,那就把工农大众的水平提升到有足够的参与管理。”^[14]因此,推动工农群众参与苏维埃国家管理的实践,必须进一步将党性的人民性从利益关切升级为能力赋能,使党员在引导工农群众当家作主中深化对人民性的践行。党性的人民性不仅体现为维护群众利益,更体现为赋予群众管理国家的能力,而不让群众参与、垄断管理权力的作风,会使党性的人民性局限于被动服务,难以实现本质跃升。列宁提出“使几十万、几百万劳动者通过工农检察院受到锻炼,学会管理国家”^{[9]48},并指出“群众已经相信自己有力量,他们不怕资产阶级攻击,开始独立进行管理国家的工作”^{[15]114},这一实践路径要求党员突破包揽一切的官僚作风,以引导者而非统治者的角色参与政权建设,因为“从统一性维度看,党的领导为群众主体作用的有效发挥提供不可或缺的支撑条件”^[16]。例如,党员指导工农群众通过工农检察院开展监督工作,既帮助工农群众“学习从前由资产阶级垄断的”^{[15]114}管理知识,又让工农群众在实

践中体会苏维埃政权是人民自己的政权；党员在这一过程中，需放下优越感，尊重工农群众的实践探索，即便“起初可能遇到种种困难，可能显得准备不足”^{[15][14]}，但这一作风，正是党性的人民性的生动体现。

结合群众诉求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实践，是对党性的人民性问题导向的强化，使党员在解决自身作风问题中彰显人民立场。官僚主义是群众最反感的作风弊病，反官僚主义斗争若脱离群众诉求，便会沦为党内空转，无法真正体现党性的人民性。列宁尖锐批评“靠纸上的决议和没有内容的批评就可以克服这种坏现象”^{[19][48]}的错误倾向，强调反官僚主义要“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一斗争的方法，最好就在提出批评的同志们工作的那些机关展开真正的斗争，并且报道这一斗争的成果和教训”^{[19][49]}。莫斯科的同志需“同管全国的官僚打交道”^{[19][49]}，而工农群众正是官僚主义最直接的受害者，其对官僚作风的感知最真切、诉求最具体。党员若能深入工农群众，收集其对文牍主义、拖拉作风等的具体不满，将反官僚主义斗争与解决工农群众办事难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如推动工农检察院真正发挥监督官员的作用，便能让反官僚主义斗争成为维护工农群众利益的实践载体。这一从群众痛点出发的反官僚主义斗争，使党性的人民性不再停留于口号，而是转化为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的成效，党员对党性的人民性的践行也随之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作为。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N].人民日报,2018-08-23.
- [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3] 陶元浩.列宁关于执政党作风建设思想论析[J].理论视野,2025(8):5-11.
- [4] 列宁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5] 魏志达.列宁晚年关于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的重要理论与实践[J].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24(4):35-45.
- [6] 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7] 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8] 肖瑶.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作风建设思想[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5(4):131-138.
- [9] 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0] 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1] 房晓军,吕新宇,孟丽.列宁党性观对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三重要求[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23):21-24.
- [12] 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3] 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4] 孙继鲁.作风·体制·文化：列宁反官僚主义思想的三个维度[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3(4):54-66.
- [15] 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6] 魏志达.列宁关于整合监督力量构想蕴含的科学思维方式[J].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25(4):42-52.

责任编辑：马俊

从“民族壁垒”到“阶级联合”:列宁胸怀天下思想的三维审视

李德琴

(贵州师范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列宁胸怀天下思想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源于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自觉继承,立足于唯物辩证法与阶级分析方法的科学运用,最终指向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忠诚实践。这一思想是科学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理论体系,包括把握世界历史发展大势,揭露帝国主义本质;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关心世界人民疾苦;发展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在全球化逆流与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交织的背景下,必须坚持列宁胸怀天下思想,以辩证思维把握历史大势,认识当代国际秩序中霸权本质;立足无产阶级立场,推动实现各国互利共赢;弘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列宁 胸怀天下 人类解放 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趋势正加速演进,但仍然存在着狭隘的民族主义将民族利益与全球利益割裂开来的现象,阻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从“民族壁垒”到“阶级联合”,列宁的胸怀天下思想延续了马克思恩格斯心系全人类解放的情怀,起着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对世界历史的形成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审视列宁的胸怀天下思想,对于促进全世

界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推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列宁胸怀天下思想的生成溯源

列宁胸怀天下思想的生成,并非偶然的理论创造,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使然。它源于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自觉继承,立足于唯物辩证法与阶级分析方法的科学运用,并基于俄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现实需要,最终指向对无

基金项目:2023 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百余年伦理精神的主要范畴研究”(立项编号:23XZZ001)。

收稿日期:2025-09-20

作者简介:李德琴,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忠诚实践,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和坚定的革命实践导向。

(一)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列宁胸怀天下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应用于帝国主义时代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整个世界体系的运动规律范围内,深刻洞察并自觉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总趋势,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吸收黑格尔等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35}帝国主义时代,金融资本与国际垄断同盟通过瓜分世界领土等形式,将整个世界更紧密、更具对抗性地联结为一个有机体。这种由资本逻辑驱动的全球化进程,打破了各民族原有的孤立闭塞状态,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着从地域性走向世界性的客观趋势。列宁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应用于分析帝国主义时代具体现实,明确了“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2]273},将世界历史与各个民族、国家间的关系概括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清楚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不仅没有改变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反而以更尖锐、更深刻的形式将这一进程推向极致。列宁胸怀天下思想实现了对世界历史进程新特点、新矛盾的深刻把握,特别是帝国主义体系内部的不平衡性与矛盾性,从而为其思考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民族问题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统一等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方法论基础:唯物辩证法与阶级分析方法的遵循运用

俄国革命与建设的现实需要是列宁胸怀天下思想生成的实践土壤,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实践中,洞察俄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内在关联,遵循运用唯物辩证法与阶级分析法分析俄国具体情况,促进了其胸怀天下思想的生成发展。

其一,唯物辩证法是列宁剖析帝国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内在脆弱性的根本方法。唯物辩证法要求从事物的普遍联系、永恒发展和矛盾运动中把握客观现实,列宁精辟地概括为“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3]700}。列宁具体分析俄国现实情况,沙皇俄国作为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具有双重属性,对外实行侵略扩张,对内镇压革命运动,与垄断资本国际勾结的现实迫使列宁在批判旧秩序的过程中形成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胸怀天下视野。在列宁看来,专制政权与垄断资本之间的勾结是世界性的,必须将俄国革命的命运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打破民族壁垒,胸怀天下,“不断加强同全世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团结”^{[4]54-55},才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其二,阶级分析法是列宁审视天下格局的另一锐利武器。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一切国际关系本质上都是阶级关系在国际舞台上的延伸和反映。“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5]295},国家行为背后是阶级的利益驱动。因此,列宁始终从阶级视角来分析国际关系,剖析不同阶级在民族问题、国际斗争中的立场差异与利益诉求,摒弃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那种抽象地、超阶级地谈论“民族利益”或“国家至上”的主张,而是深刻揭示

“民族”外壳下隐藏的阶级内容。列宁在分析复杂的国际局势和民族问题时,指出压迫民族中的资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中的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对立,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则有着联合反抗国际资本压迫的共同利益。列宁胸怀天下思想在鲜明的阶级立场指引下,超越了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世界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其核心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旨在通过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最终推翻资本的全球统治。

(三)实践指向: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坚守与践行

列宁胸怀天下思想以“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为战略支点,坚守并践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实践中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广阔视野。

其一,从“无产者联合”到“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的理论跃升。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国际性,高举国际主义旗帜,认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64]19},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64]35}的伟大号召。马克思恩格斯为了人类解放事业,领导创建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强调无产阶级的立场与人类解放事业具有内在统一性,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唤醒了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列宁胸怀天下思想深受马克思恩格斯人类解放情怀熏陶,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石,将全世界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强调“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7]326}。无产阶级若不与被压迫民族联合,便无法战胜资本主义;被压迫民族若不与无产阶级结盟,便无法挣脱帝国主义桎梏。

其二,列宁忠诚践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领导建立了第三国际,推动了国际主义的组织实践。阶级联合必须超越民族利己主义,前提是民族解放。“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6]397}无产阶级联合并非囿于民族利己主义框架,必须联合被压迫民族通过反殖民反侵略斗争瓦解资本主义体系,以国际主义打破民族壁垒,实现超越资本逻辑的阶级联合。面对第二国际后期泛滥的社会沙文主义和各种形式的民族利己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列宁积极践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提出了区分真假国际主义的明确标准,即“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8]167}。列宁胸怀天下思想直接服务于反对帝国主义、推动世界革命的伟大实践,与一切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划清了界限,这种对国际主义原则的坚定恪守与具体运用,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天下为己任的宽广胸怀与责任担当。

二、列宁胸怀天下思想的主要内容

列宁胸怀天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极具现实穿透力的思想遗产,既包含对帝国主义时代特征的深刻把握,也包含对世界人民疾苦的现实关怀和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战略预见,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历史镜鉴。

(一)把握世界历史发展大势,揭露帝国主义本质

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方向是列宁胸怀天下思想的重要构成,列宁科学研判了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剖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为无产阶级把握世界历史进程提供理论武器。

其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内涵进行界定,“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1940]。在这一阶段,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但并未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反而导致矛盾日益尖锐,使得帝国主义成为“过渡的资本主义”“腐朽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对超额利润的追逐必然加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危机,使统治的趋向代替真正的自由趋向,迫使广大阶层走向无产阶级革命阵营,这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突破口”,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提供历史契机。列宁坚持胸怀天下、把握世界历史发展大势,认识到资本家联合瓜分世界,必然会激化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也就预示着帝国主义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

其二,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特征,在马克思恩格斯“多国胜利论”的基础上提出“一国胜利论”,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1088]。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并非否定世界革命,而是以唯物辩证法重构革命主体与时空的关系,实现“局部突破”与“全局变革”的辩证统一,这种胸怀天下的革命智慧,也为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阶级斗争提供了理论指导。此外,“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在一个国家内全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11357]。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突破民族壁垒,既要维护本国革命利益,更要服从人类解放的整

体利益,通过国际联合实现生产资料的全人类占有。

(二)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关心世界人民疾苦

列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具体展开。其胸怀天下思想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将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双重使命凝结为对世界人民疾苦的深切关怀。

无产阶级立场并非抽象的道德宣示,而是贯穿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全过程。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难以实现真正的种族平等。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贫富差距巨大,工人的生活日益贫困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以及跟在他们后面的社会民主党队伍里的某些机会主义者硬说,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发生群众的贫困化。”^[1239]列宁胸怀天下思想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不仅分析了俄国的社会状况,还对德国工人的生活状况进行调查研究,认为“工人的贫困化是绝对的”^[1239]。在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富翁的财富日益增加,但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比劳动力必要费用的增长慢得多,资产阶级越富有,工人阶级的生活越艰苦,工人群众日益贫困化。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依然普遍存在,无产阶级的权利未能得到保障。“资本主义不可能使人们彻底解放,甚至也不可能使人们完全平等”^[12373],正如黑人即使摆脱了奴隶制度,但在教育、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不平等问题依然存在。列宁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种族问题的本质,指出资本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往往利用种族歧视来分化工人阶级,使工人之间产生隔阂和对立,从而削弱工人的团结和斗争力量。他聚

焦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与发展诉求,表达无产阶级的自由意志,主张阶级联合,打破民族壁垒,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推动实现人类解放。

(三)发展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是空洞的“世界主义”,而是处理民族问题、维护和平互助关系的重要原则。列宁以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构建了以国际主义为精神内核、以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为实践场域的胸怀天下思想体系。

其一,主张坚持并发展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应对资产阶级狭隘的民族主义。秉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列宁胸怀天下思想的重要内容,并非普世文化,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全球战略。马克思主义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热衷于用“民族文化”做掩护,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差别,企图将单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从世界历史中抽离,使其只着眼于本国命运,而不理解帝国主义时代人类解放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得以实现。列宁站在历史进步的一边,谴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虚伪性,认为“任何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都会在工人中起严重的腐蚀作用,都会使自由的事业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事业遭受极大的损失”^{[13]124}。无产阶级坚持国际主义原则,意味着必须反对一切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它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措施”^{[13]138}。

其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内在统一性。列宁在《论欧洲联邦问题》中指出,欧洲的联邦共同体是

帝国主义战争的“遮羞布”,它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命运共同体愿望相距甚远,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被压迫民族的苦难。共产主义实现的不仅仅是欧洲联邦,更是世界联邦,决定了人类解放命运的共同体是“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各民族实行联合并共享自由的国家形式”^{[14]367}。没有殖民地人民的解放,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国家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热烈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使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将其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体进程。列宁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具有现实的考证,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无产阶级斥责了沙皇政府企图乘中国辛亥革命爆发之机侵占邻近领土的掠夺行为,并宣布废除沙俄强迫邻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主张各国人民的自决权,推动了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历史进程。

三、列宁胸怀天下思想的当代启示

列宁胸怀天下思想体现了无产阶级领袖的国际主义精神,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为当代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重要借鉴启示。

(一)以辩证思维把握历史大势,认识当代国际秩序中霸权本质

列宁坚持胸怀天下,科学研判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进一步印证了“两个必然”“两个决不会”的正确性。在当代全球化逆流与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交织的背景下,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以辩证思维准确把握历史发展趋势,认识当代国际秩序中霸权本质,进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资本主义有其历史进步性和内在矛盾,既通过工业革命解放生产力、以法治框架打破封建特权,又因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出现

周期性危机。当前国际秩序实质是资本主义霸权的制度化呈现,必须以辩证思维认清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在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趋势中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5] 资本主义在瓦解封建专制、解放生产力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突破了自然经济桎梏,推动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但是,“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12],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列宁所定义的帝国主义时代框架内,尽管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调整,出现“新帝国主义”,还存在着一定的发展空间,但其内在的基本矛盾并未根本解决,究其本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衍生物,寄生性和腐蚀性本质成为其难以克服的痼疾,导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逆流的时代语境下,各种社会思潮和主义席卷全球,“历史终结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等论调甚嚣尘上,出现了“共产主义是空想论”的荒谬言论,严重冲击着人们的理想信念。列宁胸怀天下思想愈发彰显出其对于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理论指导作用。因此,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建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的战略定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持续加强无产阶级国际联合,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建设新世界,将理想信念转化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确保在复杂态势中保持理论和实践清醒。

(二)立足无产阶级立场,推动实现各国

互利共赢

列宁胸怀天下思想以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为价值坐标,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置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进行考量。在单边主义抬头的局势中,必须坚持列宁胸怀天下思想,立足无产阶级立场,推动实现各国互利共赢。

资本主义社会主导下的普遍交往本质上是资本谋利的功利性交往,不仅加剧了贫富差距,而且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和剥削。资本对民众的剥削与压迫愈加强烈,企图用金融资本的锁链把工人运动绞杀在民族牢笼里。无产阶级立场下的国际交往则是基于平等、互利共赢的原则,坚定无产阶级立场,扬弃资本逻辑,促进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斗争,旨在推动世界各国共同进步与发展。一方面,打破民族壁垒,推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国家却凭借跨国资本实现资本扩张,企图从中获取高额利润,消解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交流。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胸怀天下,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认识到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所带来的问题不仅仅是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的问题,而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必须从无产阶级的发展诉求出发,在国际关系中表达无产阶级意志,推动实现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另一方面,打破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不平等关系,关注无产阶级的发展利益。当前发展中国家仍面临技术壁垒、规则歧视等结构性困境,这要求国际合作机制必须实现三个转向——从资本逻辑主导转向人民中心导向、从零和博弈思维转向正和博弈实践、从地缘政治博弈转向发展问题解决,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实施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平衡劳动者与资本的价值分割,

保障广大劳动人民的发展利益。各国在追求自身发展利益的同时也要关切他国利益,摒弃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更加关注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推动全球经济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三)弘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提出的胸怀天下思想,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内核,主张全世界人民为维护共同利益、反对共同敌人而实行国际联合。弘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践行列宁胸怀天下思想的时代课题。

其一,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原则,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国际关系中的突出问题,严重阻碍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国际社会应当践行列宁胸怀天下思想,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全球南方”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取向,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共同的利益。必须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坚持多边主义原则,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抵制任何国家将自身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的行为。“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16],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其二,维护国家间的团结合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是列宁胸怀天下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他强调“我们现在不仅是全世界无产者的代表,而且是各被压迫民族的代表”^[17]。这

些民族有着沉痛的被殖民经历,构建公平正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其共同的政治诉求。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必须弘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一方面,坚持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理念。尊重各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形式的干涉和侵略行为。各国在国际协作过程中应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携手应对资本主义的霸权挑战。另一方面,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通过和平谈判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避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各国应共同努力,构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发展提供稳定的国际秩序。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3]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列宁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8] 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9] 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0] 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1] 列宁全集:第 3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2] 列宁全集:第 2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3] 列宁全集:第 2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4] 列宁全集:第 26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6]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23-03-16.

[17] 列宁全集:第 40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8]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马俊

(上接第 25 页)

提升伦理敏感度,避免技术盲从,保障数智技术应用的公平性与透明性,增强社会公众对数智治理的接受度与信任度。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2] 郁建兴,吴晓蝶,黄飏.“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的基本经验与未来[J].中国行政管理,2025(7):16-26.

[3] 本清松,彭小兵.人工智能应用嵌入政府治理:实践、机制与风险架构——以杭州城市大脑为例[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0(3):29-42.

[4] 卢珂,梁照鸿.智慧政务服务的过程性整合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22(3):58-64.

[5] 李智超,于翔.何以“加码”与如何“接码”:科层组织层层加码的行为逻辑[J].公共管理评论,2025(2):5-26.

[6] 唐任伍,佟健.公共政策意愿、传递“衰变”和监督体系催生[J].改革,2013(5):144-150.

[7] 叶战备.政务数据治理的现实推进及其协同逻辑——以 N 市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21(6):44-49.

[8] 曾凡军,冯倩.“整体性质治”何以可能?——“技术型伪创新”黑箱化困境的动态机理与破解之道[J].电子政务,2025(11):111-124.

[9] 唐任伍,马志栋.人工智能赋能政府行政效能提升的内在逻辑、现实障碍与实现路径[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89-102.

[10] 唐天伟,李淑华.“十五五”时期行政效能提升的挑战与应对[J].新视野,2025(5):25-36.

[11] 周锐,黄静.数字政府建设促进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么?——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农村经济,2022(10):71-81.

责任编辑:马俊

“‘科技变量’如何变为强劲动能”等五则

“科技变量”如何变为强劲动能

——安徽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观察

搭建平台、健全体制机制，扎实推进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更为强劲

从更大视野看，应善用市场化的方式，激发各类要素资源活力

科技创新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关键就在于“形成‘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葱郁的创新生态”

百年变局重塑全球格局，科技创新是关键变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

“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党中央高瞻远瞩、布局落子。

“安徽的科技创新，可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每一次来都看到新的飞跃、新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蕴含着国家向前发展的秘诀。

“科技变量”，如何变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最大增量”？安徽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方法论视角。

看“融合”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法。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迫切要求融合发展汽车产业、交通产业、人工智能产业、能源产业。

“合工大—蔚来创新研究院”瞄准智能电动汽车的前瞻性技术等开展攻关；超 80% 的研发经费、超 90% 的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由企业牵头……

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强化，领军企业龙头作用充分发挥，有效解决了创新链产业链“相望难相融”的问题。

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安徽被赋予重要使命。加速供需对接、创新成果转化，“芯屏汽合”“急终生智”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十四五”期间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超 16%，占规上工业比重达 43.6%。

放眼全国，融合在加速。

江苏辛巴新材料与南京大学海安高新技术研究院成立研发中心，联合攻关新型光伏玻璃技术，以“先使用后付费”模式加快实现产业化应用。

内蒙古一机集团在北京、南京、西安建立“人才飞地”，广纳科研人员，“人才在飞地研发，成果回本部转化”。

中信银行试点推出“科技成果转化贷”，聚焦原始创新能力与产业化潜力，为企业建立信用画像，放款流程提速。

搭建平台、健全体制机制，扎实推进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更为强劲。

看“有为”

市场有效，离不开政府有为、善为。每个产业链，就像一个“朋友圈”。政府要做的，就是让创新主体间加上好友。

聘“智囊”，邀请 18 位院士等专家组成汽车战略咨询委员会，通过揭榜挂帅满足企业发展的技术需求。“我参与过很多地方咨询，从来没有哪个地方像安徽一样，出的题目这么多、这么难。”有专家表示。

牵“红线”，打造开放型汽车生态实验室和汽车创新中心，围绕行业共性问题加大联合攻关力度，促进企业互利共赢。

从更大视野看，应善用市场化的方式，激发各类要素资源活力。

安徽科技大市场，累计培养技术经理人 3600 余人，从实验室“挖宝”，对接产业需求，成就“科技姻缘”。服务企业近 3 万家次，促成交易金额超 1500 亿元。

湖北打造科创供应链平台，让企业找技术像网购一样便捷，截至今年 3 月已入驻企业约 6.6

万家，释放科创需求 4.7 万多项，完成供需匹配 1.4 万多项。

辽宁大连实施科技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对重点企业“一企一策”，积极对接创新资源和金融资源，2024 年新增雏鹰企业、瞪羚企业超 300 家。

“工作中要善于抓‘两头’，一头抓具有重要影响的科技领军企业，支持其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另一头抓专精特新科技型中小企业，帮助其逐步发展壮大”，习近平总书记的精辟概括，揭示了“有为”之道。

推动各种要素优化配置，“有形之手”成为“赋能之手”。

看“生态”

建成科技强国，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形成世界一流的创新生态和科研环境。

科技创新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关键就在于“形成‘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葱郁的创新生态”。

大企业等构成“乔木层”。以“链主”企业为牵引，加大要素共享力度，可以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创新联动。

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组成“灌木层”。梯度培育细分领域“配套尖兵”，能更高效地推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

初创企业、孵化器等组成“苗木层”。构建精准化扶持体系，促金融活水滴灌创新沃土，创新的青苗能加快拔节。

在宏观政策形成合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科研机构有效对接的好环境中，“创新雨林”才能生机勃勃。

杭州形成“使命牵引—场景驱动—企业主导—资本赋能—政策护航”的创新环境，深圳光明区形成“科研—转化—产业”的全链条孵育模式……从安徽看向全国，无数创新的小生态，叠加形成国家的创新大环境。

追求卓越的创新生态，孕育一往无前的精气神。

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生，最艰难时刻靠的是“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豪情。

历经无数个“大干五十天”的失败与坚持，自主研发出第一台发动机，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深夜拨通妻子电话，相听无言，唯有发动机的强劲轰鸣声。历经一次次弹尽粮绝、迭代转型的极端困

苦，奇瑞写就从“几间小草房”到“世界 500 强”的传奇。

新时代以来，多少科研工作者矢志不移，多少“小草房”向新而生，走出前人没走过的路，趟出自主创新的大道。

当新能源汽车领跑全球，世界见证中国创造，我们无不感怀陈清泉们敢为人先，以“三电”技术突破实现换道超车，引领绿色革命浪潮。

当中国的战机惊艳世界，无数国人为祖国自豪，莫不感念宋文骢们呕心沥血，以一件件“大国重器”挺起民族的脊梁。

当 DeepSeek 横空出世，国际科技巨头惊讶，怎能不让人赞叹无数年轻创新力量奋起，以中国智慧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开辟新路径。

新征程上，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度和广度必将进一步拓展。

（作者：常晋、徐靖、田先进、罗阳奇；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8 月）

三地创新释放“裂变效应”

在环山抱水的北京怀柔科学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发出世界最亮的光；在安徽合肥的汽车生产线上，机械臂上下翻飞，1 分钟便有一辆国产汽车走下产线；在横跨伶仃洋的港珠澳大桥上，创新要素往返穿梭，一条科创走廊激发大湾区创新活力。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实地探访北京、广东、安徽三省市。从前沿科技突破，到产业科技赋能，再到区域协同创新，创新驱动产业发展带来的“裂变效应”，正成为三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态势。

“从 0 到 1”的突破，前沿创新澎湃发展“原动力”

一束光能有多亮？

“它发出的光，亮度可以达到太阳的一万亿倍，能帮我们‘看清’物质内部纳米级的微观结构。”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工程总指挥潘卫民走在一座形似“放大镜”的建筑里介绍，这是我国首台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也是亚洲第一

台第四代光源。经过5年多建设,全部光束线站接收到了“第一束光”并开展了相关的实验,实验结果也显示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卓越性能。

我们为什么需要世界最亮的光?

潘卫民回答,我国同步辐射光源已发展近40年,每一代光源亮度的提升都带来了创新成果的激增。借助HEPS,我国科学家可以进一步精细解析病毒分子结构、捕捉物质作用的瞬间、追踪电池中锂离子迁移轨迹,为更多原始创新照亮前进道路。

目前,怀柔科学城共布局37个科技设施,已累计产出重大科技成果329项,推动北京成为全球重要的原始创新策源地。

不仅要比太阳更亮,还要比太阳更热。

在安徽合肥市区西北角的科学岛上,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在今年年初刷新世界纪录,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为人类加快实现聚变发电作出了中国贡献。

“我国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这要求科技创新不能只是亦步亦趋,跟在别人后面做研究,必须要敢闯‘无人区’,尤其是要锚定原始性、颠覆性创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韩军徽认为,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原始创新则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原动力”。

作为全国大科学装置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安徽合肥目前已集中布局建设大科学装置13个,并建立起“沿途下蛋”机制,鼓励在探索科技前沿的同时,对科研成果进行应用转化。例如,科研团队基于EAST实验中发展出的超导磁体、射频、离子源等技术,自主研发出超导质子治疗系统,可精确高效治疗人体肿瘤。目前该系统已完成调试,计划今年启动临床试验。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每一个创新策源地的加速崛起,都离不开对顶尖人才的吸引、珍视。

在怀柔科学城,青年科学家走进食堂,迎面遇到的可能是诺贝尔奖得主杰哈·阿尔贝特·穆鲁,创新的火花或许就在不经意间碰撞。“在这里,从不缺乏科研灵感。”来自意大利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塞尔吉奥·切科蒂是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研究员,他说,这里不仅有顶尖的设施、自由的学术氛围,还有配套完善的生活环境,吸引汇聚全

球高水平人才,是真正的“创新家园”。

“我们要把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营造宽容、包容、高效的创新生态,深挖人才潜能,激励他们勇闯科研‘无人区’。”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肖尤丹说。

“从1到100”的跃升,科技产业融合壮大发展新动能

刚靠近位于深圳龙岗的一家无人机试验场,一阵嗡嗡声就从头顶传来。记者抬头看去,一台搭载60升水箱的农用植保无人机正平稳悬停,对下方草坪执行喷洒作业。

“我们始终把技术创新视作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深圳联合飞机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晓亮告诉记者,这台大载重的农用植保无人机只是公司众多无人机产品中的一个。“我们无人机采用的旋翼驱动技术为自主研发,已在美国、日本等数十个国家取得专利。”李晓亮介绍,多年来,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拥有多项核心技术,截至目前,已成功申请专利超600项,并在全球多个国家及地区进行了知识产权战略布局。

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腾飞。数据显示,目前广东省低空经济规模超千亿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份额占全国95%,工业级无人机市场份额占全国54%,均居全国第一。

“我们这个工厂里配备了超过1800台智能机器人,实现冲、焊、涂、总全流程自动化与数字化。”在安徽江淮汽车与华为携手打造的尊界超级工厂,负责人魏大卫告诉记者,通过应用人工智能、5G、数字孪生等新技术,其生产线多个制造环节的精度控制已达到毫米级,为国产新能源汽车迈向高端智造保驾护航。截至今年5月底,安徽省汽车、新能源汽车产量均居全国第一。

如今,科技与产业已成为一体两面、同频共振的发展孪生体。科技创新为产业发展提供“源头活水”,产业创新则为技术迭代提供应用场景和空间,两者深度融合点燃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7月2日,微元合成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生产的阿洛酮糖正式获批。这种甜味接近蔗糖,但热量极低的健康代糖,有望为我国健康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我们全球首创的‘一步发酵法’,能够以葡萄糖为原料直接发酵生产阿洛酮糖,相比传统生产方式大幅降低了成本。”该公司首席运营官李响告

诉记者,新工艺生产的阿洛酮糖在北京市相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很快就获得了市场通行证,让新技术、新产品能够快速转化为产业发展推动力。

目前,微元合成正联合全国多地开展传统生物制造产能改造,激活闲置产能,推动国内生物制造产业转型升级。位于华北的6万吨级产能改造项目将于今年10月投产,建成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阿洛酮糖生产基地之一。

“北京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产业、资本、人才‘四链融合’改革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不断完善创新、转化、应用等全周期服务,加快培育合成生物等未来产业。”肖尤丹说,北京正将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最大增量”,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从100到100n”的跨越,区域协同倍增发展效能

走进位于北京顺义区的理想汽车北京智能制造基地,涂装完成的白车身正在总装生产线上缓缓移动,三千多个零件将按照既定工序装配上车。

“别看车载麦克风不起眼,我们每个月都向理想汽车供货二三十万只。”在距离顺义300多公里外的河北省石家庄市,初光汽车董事长郑现杰忙着生产现有产品的同时,还在为理想汽车研发一款新的主动降噪传感器。该产品未来将应用于高端车型,成为公司发展新的增长点。

目前,天津、河北已有300多家关键零部件企业进入北京整车供应链。2024年,京津冀地区实现新能源汽车产量67.6万辆,同比增长154%。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集群已成功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京津冀共造一辆车”是区域产业集群化发展的缩影。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优质要素的跨区域协同,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借助一系列优势互补、开放共享的合作模式,京津冀、大湾区、长三角等区域创新集群不断涌现,创新发展由点到面,实现倍增效应。

在位于广东省东莞市的XbotPark机器人基地,众多记者对着一款两足机器人不停按下快门,脚踩“风火轮”的它可在有限空间内转圈、爬坡、跳跃,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

该基地由香港与内地科学家共同发起成立,

是按照“政府支持、企业化运作”模式建设的新型研发机构。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该基地搭建起完整的机器人产业创新生态,成为面向内地、香港乃至全球的机器人和智能硬件创业平台。目前,XbotPark体系共孵化出超140家硬科技企业,其中6家成为估值超1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

瞄准区域协同创新,大湾区已构建起“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等创新空间格局,实现多地创新资源高效流动与共享。大湾区内部,“前端研发—中端转化—后端制造”的创新闭环已颇具规模。

“近年来,大湾区科技创新进入活跃期,一批重大创新平台加快推进,初步构建了‘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认为,大湾区正加快实现从跟踪追赶向局部领先、从集成创新向原始创新、从协同创新向创新集群的转变。

从实验室创新火花迸发,到生产线上技术迭代升级,再到区域协同推动集群突破,科技创新的火苗正点燃新质生产力的熊熊火炬,映照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铿锵步伐。

(作者:都芃、刘恕、薛岩、龙跃梅、罗云鹏、洪敬谱、孙明源;来源:《科技日报》2025年8月)

安徽制造业激荡新活力

汽车产业“汽”势磅礴,光伏储能“光”彩照人,集成电路“芯”光灿烂,新型显示“屏”频出彩,量子信息前途无“量”,空天信息逐梦浩瀚星空……安徽制造业,我国制造业发展进程中的一颗新星,正为建设制造强国积极贡献力量。

2024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达5.49万亿元。位势向上、结构向优、质量向好、产业向新、企业向强……安徽始终坚持创新驱动,聚焦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制造强省战略,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大省到新兴工业大省、制造业大省的历史性跨越。

9月20日至23日,2025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举办。这场以“智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

题的大会，是一次面向未来、拥抱变革的品牌盛会，更是一场安徽制造迈向产业升级的全力奔赴。

向高端化升级

如果有人问，今年上半年，中国车市有什么现象级产品？尊界 S800 一定榜上有名。

5 月底，江淮汽车与华为联合打造的尊界 S800 正式上市，19 天大定突破 5000 台，67 天突破 10000 台，截至 8 月底订单已超 12000 台，平均成交价高达 95 万元。

作为有着 61 年历史、曾手工敲出“安徽第一车”的国产汽车老厂，江淮汽车为何要进军高端市场？

8 月 11 日，江汽集团负责人项兴初在公开直播中表示，尊界品牌已成为集团向科技型企业战略转型的重要引擎。

这呼应了江汽集团自 2024 年启动尊界项目以来的系统变革——通过超百亿元投入、智能化工厂建设、全球研发资源整合及供应链流程重构，推动这家老牌车企向高端智能电动领域全面跃迁。

位于肥西县的尊界超级工厂，是安徽省首个汽车制造领域 5G 全链路工厂；超过 1800 台智能机器人实现冲压、焊接、涂装和总装全面自动化与数字化；298 种组合工艺对数千个车身连接点进行毫秒级实时监测；数字孪生系统为每辆车建立贯穿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基因库”。“智能化、数字化、全程可追溯，这是高端制造的命脉所在。”项兴初说。

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深度调整。提升“安徽制造”在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需要加快高端化升级。

这场从“突围”到“引领”的征程，没有奇迹，只有时间和汗水写下的“争先进位”答案：“十四五”以来，安徽规上工业企业由 1.8 万户增加到近 2.5 万户，增长近四成；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由 0.85 万户增加到 2.3 万户，省级专精特新企业由 2818 户增加到 7221 户，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690 户。“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葱郁的企业生态初步形成。

瞄准高科技、追求高效能、迈向高质量，今天的安徽制造，正展露新模样，打开新空间，激荡新活力。

向智能化迈进

制造业是否强大，不仅体现在拥有哪些产业、能够造出哪些产品，也体现在生产组织方式上，体现在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上。

108 台机器人高效协同作业，AGV 无人小车穿梭自如、精准配送，MES 系统实现生产全程的可视化管控……在安徽中恒电喷系统有限公司的数字化车间里，企业投入 8000 万元打造的“智能仓储+AGV 配送+MES 管理”系统，显著提升了生产效能。

“通过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实施分车间‘链条式’生产，企业生产的汽车燃油泵型号超过 1500 种，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多地市场。”公司生产部负责人袁欣介绍，凭借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的全面应用，公司产值持续快速增长，去年全年突破 5 亿元。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不再是企业的“选择题”，而是关乎长远发展的“必修课”。

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程英春表示，近年来，安徽将数字化转型作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抓手，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已 100% 启动数字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工作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下一步，我们将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为主线，进一步完善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体系和工作推进机制，建立健全生态服务体系，从加强数字化转型工作保障、加快推进数字化改造、注重培育典型场景和解决方案、大力提升数字化转型服务能力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向更深程度、更高水平迈进。”程英春说。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安徽新增实现数字化改造规上制造业企业 3841 家，累计实现改造企业 2.05 万家，占全部规上企业的 83.02%。

向绿色化转型

2024 年，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名单，成为安徽省 311 家国家级绿色工厂中的一员。

“绿色化转型，是挑战，更是机遇。”公司负责人刘吉文介绍，工厂通过智能化改造，建成了国内领先的柔性生产线，生产效率提升 35% 以上；集成能源管理系统的使用，让万元产值能耗降低 18.7%、产品碳排放下浮超 20%。

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正实现从“被动降碳”

到“主动领跑”的转变。一个个绿色工厂的建设与发展,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工业领域的具体实践。

今年4月,海螺集团联合华为公司,发布“AI+水泥建材大模型”。在生产优化环节,窑炉控制参数自动推荐使劳动强度缩减50%,标准煤耗下降1%,年减碳6318吨。海螺集团技术人员算了一笔账:按日产5000吨熟料线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4500吨,相当于种植了18万棵树的碳汇效益。

作为工业碳排放的重要单元,工厂的绿色低碳转型不仅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举措。

夯实功底、持续发力,安徽制造业以绿色塑造竞争力。目前,安徽已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311家、绿色园区31个、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53家,数量居全国前列。“十四五”以来,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14.2%,超全国同期降幅4个百分点。

以实力创造机遇,以开放链接全球,以共进实现共赢。当制造业的“安徽力量”再次闪亮,更多的瞩目与期待、共识与笃行、相遇与相融,正被同步点亮。

(作者:韩俊杰;来源:《人民日报》2025年9月)

“知产”变资产! 这个城市每天 冒出4家科技成果转化企业

新的飞跃、新的发展!

在安徽合肥,抓科创这个关键变量,2025年上半年依托科技成果转化新成立企业771家,平均每天达4家以上,更多“知产”变资产。

张强的故事具有代表性。

36岁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研究员张强,多了一个新身份:智地感知(合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他坦言:“我原来根本没想过出来开公司。”

促使他从实验室“转战”市场,是来自当地创新生态的“引力”与“推力”。

几年前,他所在的研究团队承接了一个“用地下光缆监测地震”的科研项目。项目完成后,摆在

他们面前有两个选择。

“对科研人员来说,第一个选择是传统选项,发论文、出成果、评职称,这条路顺理成章,也没有风险。”张强说,另一个选择是把项目推向应用市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这条创业之路有多难?从创新托举“最初一公里”到打通转化“最后一公里”,全链条加速创新落地应用,尤为关键。

他和团队同事感觉到,校内校外的氛围和导向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中科大启动了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鼓励师生创新创业,另一方面,合肥市科技局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寻宝”。

合肥市科技局局长范进说,合肥探索“大科技成果转化”新模式,深入科研院所“寻宝”“挖宝”找创业苗子,“科创团队缺什么,就尽力帮他们找什么”。

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闯出新路,让“乔木”参天、“灌木”茁壮、“小草”葱郁。

缺启动资金,合肥市种子基金投出“第一笔钱”;缺创业场地,政府提供近千平方米办公场所;缺应用场景,科技管理部门帮助联系合肥轨道交通集团、合肥水务集团等企业做“创业伙伴”共同探索创新应用;缺产品销路,合肥拿出市政府大厅为企业开首款产品发布会,积极帮助企业参加全国性的展会广泛推介……

当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科研成果就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加速转化。

如今,智地感知公司转化开发出的产品,已在全国多个省市实施应用,公司今年销售额有望突破3000万元。

“从当初的没想创业,到如今打开市场局面,创业的每一步都获得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托举’支持。”张强说,合肥厚植创新创业沃土,让他们快速走出了“新手村”融入市场。

对于25岁的外来创业者闵宇恒来说,在充满希望但也充满挑战与风险的新型机器人领域“起飞”,需要应用场景、耐心资本和产业协同。

如何为“敢闯者”插上有力的翅膀,让“异想天开”在实践中绽放?

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闵宇恒就曾先后创立两家公司。今年1月,他带领年轻的团队与合肥市相关部门首次对接,成立合肥零次方机器人有限公司。成立不到8个月,公司获得3轮风险投资,

人员规模从 20 多人扩展到 80 多人。

找准产业需求,靶向创新,打造“聚合型智能产业”集群、加速构建耐心资本“丛林”……在“多点开花”中,城市与企业共建生态,相互成就。

眼下,合肥零次方机器人公司多款机器人产品业内领先,应用场景涵盖家庭服务、科研教育、文娱展览等,目前意向订单总额已近亿元。

“上个月我们首批交付了 10 台机器人,这个月交付 40 台,到年底累计交付量将达到 500 台。”闵宇恒说,公司的快速发展,展现了来自合肥创新生态的蓬勃生命力。

从量子、AI、机器人到新能源、新材料,近 3 年来合肥市捕捉高校院所科技成果 8000 余项,依托科技成果推动新成立企业超 3000 家,其中估值过亿企业超 100 家,推动合肥市今年上半年经济总量增长 6.0%,增速在全国 GDP 总量过万亿城市中居于前列。

地处内陆的合肥,是全国创新创造热潮中的一个缩影。

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科技要打头阵。全国多地正积极搭建科技成果转化“桥梁”:有的通过场景开放,推动市场化应用;有的通过全生命周期的资源、政策和服务支持,助力企业完成“从 0 到 10 再到 100”的成长。

让创新链和产业链“双轮驱动”,更多的科技成果就能从书架走上货架,向“新”求“质”。

(作者:徐海涛、吴慧珺;来源:新华网,2025 年 8 月)

科研成果从“书架”走上“货架”, 为何如此之快?

统计数据显示,合肥市今年上半年依托科技成果转化新成立企业 771 家,平均每天“新生”4 家。近年来,合肥通过全链条服务,推动科研成果加快从“书架”走上“货架”,从“生产线”走向“大市场”,上演了科技成果转化“合肥速度”。

进入 9 月,陈玉霞的工作节奏明显加快。一边是繁忙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一边是企业里的繁杂事务。好在一切都在按部就班进行中,陈玉霞始终处于“累并快乐着”的状态。

过去的 10 多年时间,安徽农业大学材料与化学学院教授陈玉霞围绕一种常见的农作物——丝瓜络开展科学研究。尽管所带团队拥有多项发明专利,但是陈玉霞与市场的相关企业一直以来也只是保持“有限的接触”。

直到去年,安徽乐福儿家居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作为公司创办人的陈玉霞终于“以身试水”,与市场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陈玉霞觉得,让她下定决心的,是来自方方面面的“推力”。“从省、市相关部门,到学校里的领导,都在‘推’着我做这些事。”陈玉霞说。

在安徽省合肥市,这样的“推力”形成于全市的一项系统性工程,即以全链条服务体系为桥梁,打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合肥市依托科技成果转化新成立企业 771 家,平均每天“新生”4 家。

全过程培育让科研“瓜熟蒂落”

在安徽农业大学人体工程学研究室的实验室里,陈玉霞和她的团队正在让普通的丝瓜络变身为健康家居的“黑科技”材料。

利用丝瓜络的增柔性能以及高吸湿、高散湿、高透气、抗菌防霉和亲肤助眠等特性,陈玉霞团队不仅将丝瓜络制造成弹簧,用以代替床垫中的金属弹簧,而且将丝瓜络填充进床垫中,用以及时调节床垫温湿度,避免高温高湿环境滋生细菌和螨虫。

从 2013 年启动研究至今,陈玉霞科研团队已经获得丝瓜全产业链专利 30 余项。

“一直和相关企业有产学研的合作,不过主要停留在‘市场反馈—技术攻关—人才输送’的层面。”陈玉霞此前虽然动过创业的念头,但一想到面临的各種不确定性,就放弃了。

转折点来自合肥市科技成果转化专班一行人到安徽农业大学的一次主动上门走访。面对陈玉霞提出的各种担忧,学校领导、专班人员斩钉截铁地说,“你们大胆地干!”

这不仅是一句激励的话语,背后更有着若干政策“干货”和实际行动的支撑。

在学校层面,安徽农业大学是安徽省属高校中首批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试点单位之一,并且创造性地推行“赋权+转让+约定收益”的成果转化新模式。该机制赋予科研团队以知识产

权入股企业的权利,这使他们不仅能掌握企业的控股权,还能拥有企业经营决策的主导权。

在实际运作层面,合肥市还有一家为科技成果转化企业提供早期开办服务的科大硅谷服务平台(安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大硅谷公司)。在陈玉霞创办企业的过程中,科大硅谷公司人员组建服务团队从公司股权架构、搭建步骤、组织管理、发展规划等方面给予了“手把手”的帮助。

场景匹配让论文“不锁在抽屉里”

如果说陈玉霞的科技成果转化历程是一次“找上门来的服务”的话,那么合肥工业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教授苏建徽的经历,更像是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的“双向奔赴”。

今年初,位于合肥市包河区的安徽快易电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易电公司)推出了一款高功率无线充电产品。这款产品采用先进的电磁感应耦合技术,可实现最高96.6%的高效率能量传输,大幅减少了能量在传输过程中的损耗,远超行业平均水平。

这项突破性的新技术正是快易电公司与苏建徽团队合作的成果。

作为无线电能传输关键技术的专家,苏建徽手中握有很多关键科研成果。如何让这些科研成果“不锁在抽屉里”,苏建徽曾经做过若干尝试。

“就这项科研成果来说,我有过几次和企业方的合作经历,可是最终效果都不太理想。”苏建徽觉得,有些企业过于急功近利,想赚快钱,不愿意在研发上投入过多。

对科研团队来说,一旦失去应用场景的支撑,很有可能意味着这项研究陷入停滞或者后继无人的窘境。这对科研人员的信心是致命的打击。

与快易电公司的合作是在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智能院)时任常务副院长张晓安的“撮合”下实现的。彼时,刚刚转入新能源赛道的快易电公司迫切需要新能源充电的前沿技术,双方可谓一拍即合。

撇开双方拥有接近的价值观因素,张晓安觉得,这与智能院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试点,制定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施办法不无关联。

这项制度引导拥有成熟技术成果、稳定研发队伍和明晰科研计划的科研团队,与有接纳新技术能力和扩大生产需求的企业有效结合,按股份制合作模式共同创办企业,探索校企“共生”式科

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合作新模式。

在苏建徽团队的大力支持下,快易电公司在市场上取得长足进步。“目前,我们团队储备的新技术,足以覆盖未来五年的市场需求。”快易电公司董事长王亚说。

全链条服务推动科技成果从“书架”走上“货架”

3年前,合肥市在安徽省率先成立科技成果转化专班,旨在加快推动科技成果就地交易、就地转化、就地应用。

这些专班人员从市属企事业单位以及县(市、区)等方面抽调组成,主要工作是常态化开展项目发现、挖掘、策划、转化和服务。

据合肥市科技局局长范进介绍,合肥科技成果转化专班紧扣发掘研判、投融资保障、产创融合、场景对接、人才服务、落地承接等重点环节,开展全链条、全流程、常态化的成果转化服务,为科技成果量身打造转化路径。

截至目前,合肥市已经成立了5个市级、13个县区级、31个“一对一”科技成果转化专班,建立覆盖安徽全省的科技大市场。同时,在项目发掘研判方面,合肥市科技局引入专业化机构开展可转化科技成果评价,为科技成果“把脉问诊”。

此外,合肥还成立了7家科技成果概念验证中心,通过技术成熟度、市场前景、团队能力等多维度评估,快速锁定高潜力项目,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3年多来,专班人员交出的答卷是:对接捕捉全国高校院所科技成果1.8万项,推动3000多家科技企业落地。

从“书架”走上“货架”,从“生产线”走向“大市场”,科技成果转化就这样跑出了“合肥速度”。

(作者:陈华;来源:《工人日报》2025年9月)

本栏目供稿、责任编辑:黄宁平

启 事

本栏目属转载文章,因客观原因未及与作者提前沟通,请作者看到本启事后,与本刊编辑部联系(电话:0551-62206629),编辑部将按本刊相关制度向作者支付稿酬。

興國



中石書


富強 民主 文明 和諧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愛國 敬業 誠信 友善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明理路
邮政编码：230031
电 话：(0551) 62206658 62206629
电子邮箱：XB1233@126.com

印 刷：合肥新南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方式：自办发行
定 价：5.00元

